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人看中国



这也是一面镜子

（前言）

要知道自己的衣着是不是整洁，可以照一照镜子。

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适当，可以听一听别人的意见。

认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也有必要听听外国人的看法。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信日益发达，今天的地球已经显得愈来愈小了。

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愈来愈多了。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们一定要学习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好东西，用来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我们只能算是个穷国。

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切都不如人；更不等于说，我们没有赶上别人的希望。

在这本小书里，我们收集了一些外国人对中国的评论。

这些外国人，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有欧洲人、美洲人，也有亚洲人、非洲人；有政治家、哲学家、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学生；有老年人、青年人，也有孩子；有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有到中国来进行掠夺的强盗。

我不能说，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他们也不能代替我们把中国的情况分析得十分全面、准确、深入。

在这些外国人眼里，中国是他们的外国。他们看中国是带着一些好奇、新鲜，甚至是神秘的感觉的。

但是，他们的看法，对我们来说，仍旧不失为一面镜子。了解这些看法，对于我们认识自己这个国家，是可以有所帮助的。

至少我自己，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是相当激动的。

我们的民族确实是伟大的民族。无论在历史上，或者是现实，我们都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东西。

爱护它、发扬它，而又虚心学习别人的好东西，振奋精神，艰苦创业，我们没有理由不能重新跨进世界先进国家之林。

外国人看中国人

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的贡献

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有些人却以为中国一切都不行，中国的一切都要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要全部抛弃，只有“全盘西化”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都照搬过来才是出路。在他们看来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人恨不得把中国的人种都换了。照他们的说法，中国人只有“劣根性”，中国的传统思想只有糟粕，只能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们的这些说法究竟对不对？

看一看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候的思想家们是怎样对待中国文化的，可能是有益的。

启蒙运动是 18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时正处在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们对中世纪统治欧洲的封建意识形态发起全面批判，企图使人们的思想从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基督教会和专制政治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凭理性的力量发现有关自然、人类和社会的法则，谋取世俗的幸福：他们以理性、宗教容忍和进步的观念向保守现状的旧观念进行冲击，反对一切禁锢思想和压制自由的教条和制度。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场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文化思想，虽然也是封建主义的，却受到欧洲许多进步学者的推崇，并被他们借用来反对欧洲人自己的封建思想和制度。这个有趣的现象，是不是能给我们以某些启示呢？

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主要是从西方来到中国的传教士。这种来华传教的活动，从 16 世纪中叶以后就开始了。主要人物有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张诚、徐日升、白晋等人。这些人都具有“高深的学术及绝顶的聪明”，他们回国之后大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当时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几乎全部是经这些传教士介绍的。例如，利玛窦所著的《中国札记》（即日记）经比利时人金尼阁整理出版，成为继马可波罗以后全面介绍中国的巨著。这本书出版了 4 种拉丁文本、3 种法文本，还出版了德、西、意、英等各种文本，接着，各种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例如《四书五经》、有关孔子及其思想的介绍、朱熹的《通鉴纲目》、有关中国音乐、舞蹈、宗教和天文、数学、历法的书都陆续出版了。在马德里出版了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在荷兰出版了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和《中国史初编》。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通过传教士了解到中国古代著作《尧典》中有关星座的记述以及推算日食的方法。有人把《论语》、《大学》译为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智慧》；把《中庸》译为拉丁文，名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孝经》、《幼学琼林》都有人译为拉丁文。雷孝思还翻译过《易经》。随着制作精美的中国货物的输入，以及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赞誉，欧洲社会掀起了一股崇尚中国古老文明的热潮。王公贵族竞相收藏和使用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和漆器。瓷器代替银器之风盛行于社会。以形象纤细色泽清淡为基调的中国瓷器，成为盛极一时的罗柯柯艺术的典型材料。著名画家华托在《向锡西拉岛开船》这一杰作中，突破欧洲传统技法，吸收中国宋代画派着色浓淡相宜

的手法（此画至今珍藏在巴黎罗浮宫）。中国的建筑款式风靡一时。以中国题材为内容或者以想象中的中国人物为主角的戏剧应运而生。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编写了《中国孤儿》，上演后轰动了巴黎。身着中国服装的舞会风行欧洲大陆。巴黎的许多娱乐场所，有中国式的秋千。沿街有中国式澡塘。卖艺人模仿北京庙会的习俗，点油灯、放焰火、鸣鞭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就有高度的文明了。”“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德国学者葛林指出：“中国已成为欧洲思想界谈论的课题之一”。

那么，这些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又是怎样从中国的文化资料中吸收营养的呢？

首先，中国古老灿烂文化的存在，以及这种文化的被了解本身就是对基督教创世说和“欧洲文化（实际上指基督教文化）中心说”的一种打击。许多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武器来向基督教的文化专制进攻。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一个公教（基督教）、一个普遍的文化（西欧文明）”的观念，自罗马帝国以来，“始终不断地在萦绕着人们的思想”。然而，汉学家戴密微指出，中国的存在，“打消了许多人的偏见，使西方人茅塞顿开，懂得了欧洲和基督教的相对性。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出现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古老性本身就动摇了基督教圣书中关于世界的年代记述。莱布尼茨更根据中国的存在大胆地提出了人类是“多元结构”的论断，直接动摇着基督教神学统治的基础。他说，中国的发现，才使欧洲的学者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

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出乎那些热心介绍中国的传教士的意料的。德国汉学家赖赫淮恩在《中国与欧洲》一书中说：“那些耶苏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而且须将中国思想付诸实行。他们不知道中国经书中的原理，刚好推翻了他们自己的教义；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给欧洲的学者，因此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便能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的一个理想的模型。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德性的民族了。”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更对中国文化赞颂备至。他在《哲学辞典》的《光荣》条中，借一个荷兰人之口，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众和治理最良好的国家”，而讥讽欧洲的官吏教士目空一切“妄自尊大”的丑态。中国成了伏尔泰以及同时代其他启蒙思想家笔下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其次，欧洲启蒙思想家主要的观点就是以“理性”来反对宗教神学的“悟性”，用“自然法则”来打破“一切都出自上帝安排”的“神的意志”。英国科学家胡克在《关于中国文字和语言的推测》一书中认为，西方启蒙主义者推崇的“理性”一词即来源于中国。事实上，当时传到欧洲的中国学术思想，主要是宋明理学，即使是孔子和原始儒家的经典，也是经过理学重新塑造了的。理学讲的“理性”当然和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却被他们利用来作反对迷信和盲从的思想武器。

照汉默顿的说法，“理性”，就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

于奇迹的倾向”。而中国的孔子就是以“子不语怪”著称的。黑格尔说，“认识这些（理性或自然）法则的合法性则称为启蒙”。中国的儒家虽然并不公开否定神的存在，却很少讲到它。他们讲得多的是“天”、“理”。伏尔泰说，中国的“理”或者“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还说：“中国这段长久的历史有一点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中国的一切几乎全是可能的，自然的。我佩服他们什么事都没有一点神奇的意味”。

伏尔泰特别佩服孔子。他说，“我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并作了摘要；我发现书中所说的纯粹是道德。……孔子只诉之于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甚至在礼拜堂中供奉起孔夫子的画像。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是最强调“自然必要性”的。他所讲的“自然必要性”带有客观规律的意思。他认为，这才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对这种制度的必要，在所有的国家中，除中国以外，都被忽视了。”

黑格尔还把中国哲学著作中的“道”解释为“理性”。他说，“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的学术。”

欧洲启蒙思想家们还十分赞赏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和教育。莱布尼茨的学生伏尔夫做过一篇题为《中国实用哲学》的演讲，盛赞孔子的道德学说，并且说中国的学校制度是施行品德教育的模范。后来，重农学派便根据伏尔夫的提示，按照中国学校的蓝图，草拟了国立学校的计划。

第三，这些启蒙思想家们还借用中国的实例来鼓吹政治改革。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比欧洲中世纪的暴政开明多了。“中国历史中的仁君之治的传统与清初的大一统政府”被他们看作“理想的政府”。莱布尼茨说中国康熙皇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伏尔泰也认为，对于这样的政府，“唯有信服赞叹，心向往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树立一个楷模，让“欧洲的君主”“取法”，来建立他们心目中的“哲学家的政府”。

在其他许多具体学说的形成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现代计算机的基础——二进制数学是莱布尼茨创立的。许多人认为，他的这个成就形成和完善化的过程中，受到过中国古代《易经》和宋朝的六十四卦图的影响。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莱布尼茨成为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先驱，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莱布尼茨曾经在与访华的欧洲传教士的通信中，得知《周易》“八卦图”与“伏羲画八卦”的传说，异常兴奋。他说：“易传是流传于宇宙间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伏羲是古代的君中王，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并且是中华帝国和东洋科学的创造者。”他在制成了能计算加法和乘法的计算器之后不很久，就托人把一架复制品送给了康熙。他还亲自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新的消息》，并在序言中说：“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因而应当彼此相互学习”。

伏尔泰主张道德应该是“自然道德”，而这种“自然道德”的基础就是孔子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联学者索柯洛夫说：“应当作为个人行为基础的主要道德律，被伏尔泰表述为这样一个超历史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道德律，就是‘天生在我们心中’的‘自然道德’的基础。‘自然道德’是和我们的理性的要求相符合的，所以是同文明不矛

盾的，而是与它符合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根据伏尔泰的意见，是以人类理性的进步为基础的。”

至于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更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思想的烙印。魁奈在其名著《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对中国的重农主义和中国君主重视农业的传统赞誉不已。他“痛感欧洲各国没有理解农业的价值及其必要性”。于是，他鼓动法皇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藉田的仪式。

欧洲启蒙思想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能说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直接引出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思想。欧洲现代思想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当时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他们曾经相当重视中国文化的事实，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包含着若干合理的因素，而不是象我们有些不争气的中国文人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问题是我们自己如何去分清精华与糟粕，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善于发现和运用我们的文化瑰宝。

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

弗兰西斯·培根在谈到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时候曾经说：“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 and 影响。”培根是十六至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现在中国的青少年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可是，在当时，培根对中国知道得却并不多。他似乎也并不知道这三项伟大的发明，都是来自中国。

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知道得太少了。他们以为任何一种重要的发明都只能发生在欧洲。这种偏见在人们中间延续了很长时间。许多中国人自己也这样看问题，谈到科学技术，就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从西方来的，好象中国在这方面只留下了一片黑暗。例如：利用植物学知识来寻找矿藏的方法早在公元六世纪（南朝梁代）就在我国开始运用了，可是直到解放以后，北京出版的一本介绍这种方法的书，竟没有提到这个事实。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在欧洲人当中，也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十七世纪有一位英国人罗勃特·胡克，在《皇家学会会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文字和语言的文章。他说：“我们还只是刚刚走到这个丰富的宝藏的边缘。”真正用几乎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历史的，要算当代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

李约瑟生于1900年。他本是一位生物化学家。他在1929年写的《胚胎学史》，直到今天仍旧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1937年开始，他自学中文，开始了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万里长征”。他用四十多年的心血，七次到中国，写出了七大卷的巨型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

在这本书中，李约瑟把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八世纪先后从中国传到欧洲等地的发明，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单子：A、龙骨车；B、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应用；C、水排；D、风扇车和簸扬机；E、活塞风箱；F、平放织机和提花机；G、缫丝、纺丝和调丝机；H、独轮车；I、加帆手推车；J、磨车；K、牲口用的胸带和套包子；L、弓弩；M、风筝；N、竹蜻蜓和走马灯；O、深钻技术；P、铸铁的使用；Q、游动常平悬吊器；R、弧形拱桥；S、铁索吊桥；T、河渠闸门；U、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发明，包括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和前后索具；V、船尾的方向舵；W、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X、罗盘针；Y、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Z、瓷器。李约瑟写到这里用完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可是他觉得还有许多例子没有举出来。我们现在正在从国外引进开凿油井的新技术。可是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今天在勘探油田时所用的这种钻深井或凿洞的技术，肯定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我们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技术早在汉代就已经在四川加以应用。”

李约瑟说：“中国人从公元前一世纪起便开始观察和记录太阳的黑子”，而那时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太阳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东西，它上面不可能有任何斑点。

李约瑟看到，“第一座铁索吊桥至少早在六世纪便已在中国建造起来”，而“建造吊桥的原理到十六世纪末才被欧洲人知道，而在欧洲建造第一座吊桥则是在十八世纪末叶。”

“ 医疗体操的技术，一般认为是十八世纪瑞典人对欧洲的贡献，事实上可以看出，它是从中国早期道家的练功直接发生的。 ”

“ 首次制成的赤道仪并不在乌兰尼堡或维也纳的工场里，而是在中国元朝的大都 ”。

李约瑟的书是写给欧洲人看的。他要使人看到“ 欧洲从中国汲取的技术是何等的丰富多采 ”，他要欧洲人看到，中国人的“ 惊人的科学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善于思考的洞察力 ”。

那么，中国人从李约瑟的书里可以得到什么呢？1943 年，李约瑟在中国四川作了一次有关中国科学史的演讲。当时听众当中有一位中国人受到他的演讲的激发，从而开始了对中国早期的火药和火器史研究，并且给了李约瑟很大的帮助。我们相信，其他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青少年，也会被激发起来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应当对自己祖国的历史知道得更多呢？从这些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提高自己的自信力呢？

席勒笔下的孔夫子箴言

现在，大家都强调接受新思想，新思潮，这无疑是对的。

许多人又特别注意学习外国人的新观念。这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能不能认为中国人传统的学术观念全都是一堆垃圾，今天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呢？恐怕不能这样说。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民主革命走上了新阶段。那时候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做“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有它的积极作用。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确实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当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指出的，“五四”运动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缺乏分析的态度，好就认为一切都好，坏就认为一切都坏。对孔子思想中许多合理有用的东西，当时就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

至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从“破四旧”到“批孔”，更是对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棍子扫得精光。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灾难。这场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段经历，而应当永远记取它的经验教训。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其中许多人是唯心主义者，大多数都是站在维护奴隶制度或者封建制度立场上的。但是，他们的著作、他们的观点，却不能说没有包含许多智慧的花朵，也不能认为他们丝毫没有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平心而论，就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深刻的哲理，至今仍然可以对人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的各种问题。

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时期，许多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对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曾经抱有很大的兴趣。大约在17世纪，欧洲天主教到中国的传教士，为了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先后把《大学》、《中庸》、《论语》等译成拉丁文，向欧洲人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和事迹。欧洲不少学者如伏尔泰、狄德罗、歌德都曾经研究过孔子。这里我们只介绍一下德国著名诗人、戏剧家席勒写的关于孔子思想的两首小诗。

席勒生于18世纪后半世纪。他的作品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著名的剧本有《强盗》、《阴谋与爱情》等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他被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公民。他的著名诗篇《欢乐颂》被贝多芬选用片断作为《第九交响乐》的主题合唱曲，至今仍然传诵于全世界。他的题为《孔子的箴言》的两首诗，发表于1795年和1799年，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的那一段时间。第一首写的是对时间的认识和态度。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

未来姗姗而来迟，

现在象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

当它缓行时，任怎样急躁，

也不能使它的步伐加速。

当它飞逝时，任怎样恐惧犹豫，

也不能使它的行程受阻。

任何后悔，任何魔术，

也不能使静止的移动一步。

你若要做一个聪明而幸福的人，
走完你的生命的路程，
你要对未来深谋远虑，
不要做你的行动的工具！
不要把飞逝的现在当作友人，
不要把静止的过去当作仇人！”

第二首讲的是对空间的认识和态度。

“空间的测量有三种：
它的长度绵延无穷，
永无间断；它的宽度
辽阔万里，没有尽处；
它的深度深陷无底。

它们给你一种象征：
你要看到事业垂成，
必需努力向前，不可休息，
决不可因疲乏而静止；
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
必需广开你的眼界；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需审问追究到底。
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
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察世事，
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

在这两首诗里没有一句直接引用孔子的话，但又很符合孔子的思想。我们可以从《论语》、《大学》、《中庸》这些著作中看到许多类似的论述。例如，毛主席也在诗中引用过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讲的就是时间象流水一样不停地过去。这种流动是任何人也阻碍不了的。

《论语》上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过去，是改变不了的，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并且为未来而付出自己的劳动。

但是，对于过去，也不能简单地把它抛弃。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商朝（殷）继承了夏朝的礼仪制度，又有所增加和减少；周朝继承了商朝的礼仪制度，又有所增加和减少。这才是对过去采取的正确态度。

由于空间的无限广阔，事物的无限多样，本质的深藏不露，孔子反复强调“博学”、“学而不厌”，强调“每事问”的精神，强调做人要“有恒”，他引证古话：“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为什么会差一点不做到底呢？这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他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强调做人要经得起考验。他还强调对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只听人家自己表态的话，就容易上当。他还说要“多闻阙疑”。无论对事情了解得多么多，总还有不了解的方面，对这不了解的方面，就要采取老实态度，“不知为不知”，保持疑问，继续探索，才能不断地向真理前进。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位 18 世纪的德国诗人成为研究孔子思想的专家，也不可能要求在两首短诗里概括孔子的全部思想。从席勒的这两首短诗，我们可以看到，在资产阶级革命和上升的时期，他们是怎样吸取人类文化遗产的。从这两首短诗所论述的孔子思想，我们还可以想到，这朵智慧之花，对我们今天的做人，处事、建功立业，也不是没有用处的。我们难道要把这些花朵都留给外国人去采摘吗？

米书的故事

当代法国青年作家让—马利·布拉·德·罗布莱斯写了一篇关于古代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的小说；《米书》。小说假托十四世纪一位英国人戴维·达什比的日记残篇，甚有趣味。

据说，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成功的中国之行，引起了英国君主的不安。于是，英王爱德华一世派他属下最杰出的一位神职人员戴维·达什比到东方去，与元朝皇帝建立联系，以抗衡罗马教廷的影响。这位戴维·达什比在北京皇宫里度过了好几年，出色地学会了中国话和中国字，还写了他的回忆录。在他留下的手稿中，有几页日记。以下就是这几页日记的摘录：

1347年2月17日于佛罗伦萨

今天，已是我降生尘世的第35个年头，从卡特伊归来也已有数月之久。

我在那里生活了8年。8年间，我拜一位年长的中国学者尚夫子为师。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会了我汉语中无数精妙之处。他成为命运使我幸遇的一位真正的挚友。然而，在我离开那儿的一星期前，他却被控犯有可耻的叛国罪，关进了监狱。接着他又被判处刀割三日，然后斩首。我想为他求得宽恕，但可怜地失败了。我别无他法可想，决定到监狱里去向我的忘年之交诀别。

尚夫子死死地盯着我，用目光对我剖析，好象竭力要再次检查一下我的为人和我的感情的真正实质。

他终于开口了，命令我把一只系在他腰带上的皮囊取下来。

“这是一部米书，”他说，“我将它托付给你。它包含了万物的终极真理，它能解答人类提出过的所有问题，以及将来有一天会提出的问题；而且也能解答人类过去从未提出过、将来也绝不会提出的一切问题。”

老人要我起誓，绝不抄录或者翻译他遗赠给我的这件珍宝中的任何一个字。

“书籍会被烧掉，”他说，“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消除人的记忆，能割断我们头脑中生命之树无穷无尽的圆圈中的任何一环。古人传说以三万御林军为自己殉葬的那位秦始皇帝，他也做不到这一点。他焚毁了所有祖传的书籍，然而年老的儒生早已将这些书熟记在心；他坑杀那些老儒生，但是人民将他们藏进了密室；他火烧密室，但是老儒生们的子孙辈，已将这些无形的书熟记心中……”

我回到住处，打开口袋，里面是一大捧棕色的大米。我感到辛酸，心想，监禁已经使老人的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我怀着悲痛和抑郁的心情离开了北京，来到意大利，佛罗伦萨。”

贝帕太太把屋子最大的房间租给了我。她的女儿焦娃娜快18岁了。又聋又哑，她那举世无双的美貌与她智力上的残疾都同样地令人吃惊。只要向她瞟上一眼，就可以从她那双比雕像更空洞、更呆板的眸子里，发现她娇媚的外表掩饰着可怕的空虚。

我对已被人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和哲学的兴起着了迷。难以解答的问题再次使我困惑不安，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对能使我们永不迷途的方向的追求，超越了所有使我迷醉的光彩夺目的东西。但丁的不朽诗篇以其完美无暇使我心醉神迷，但它却在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一丝不断加深的悲哀。

不可名状的忧郁将我投入了重重疑虑和精神受尽折磨的地狱里。

追忆起过去的岁月来，我取出那袋大米，把米粒倒出来，一粒粒数着。在夕阳平射的光线照耀下，我觉察到米粒上布满了极细小的符号。我惊讶万分，于是借助一个倍数很大的放大镜，终于发现米粒上有一系列中国文字，组成了一篇文章，相当于我们最大开本的书上写得满满的一页。每个米粒都无一例外。没有魔法的帮助，人类是不可能创造这种奇迹的。

在我面前的是一部《米书》。米袋里的五千粒米，没有页码。我随手捡起一粒就开始阅读，我发现这部米书的上下文永远能紧密连贯，就好象我的手每次都选中恰好合乎逻辑地连下的那一页一样。当我使每一粒的顺序都不同于第一次阅读时的顺序时，上面说过的那种现象重又出现了，不过这次我面对的是一篇新的文章，与第一次顺序形成的文章截然不同。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部米书就会一部一部地再现孔夫子、公孙龙、墨子，以及许多其他已被人淡忘了的人的作品。

有人打比方说，当真理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就象被雷电击中一般。我在读米粒的时候，果真感到一阵烈火灼身。我所有的疑问都找到了最终的答案，所有未解之谜都在不容置疑的真理面前冰消瓦解。相比之下，最具真知灼见的圣书（《旧约》、《新约》、《古兰经》，甚至我在印度曾学过的佛门教导），也突然原形毕露。人们侈谈天国、道德、报应、惩罚、苦行、仁爱、祭祀……这些都是可悲的许诺，徒劳的召唤，《米书》中的一句箴言，就能使它们显得荒唐无稽。

一读这部书，我顿时犹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感到了自由和力量，以及一种人类发出的耀眼的光辉，它使万物在宇宙间各得其所。

这部米书不满足于揭示世界的起源和终极命运，它还通向一座不可思议的高峰，它的每一粒米都在学识的奇迹般的螺旋体上增加一圈。

我刚刚从我所读的文章上把眼睛挪开，我就完全回想不起我所读过的一切。就好象做了一个美梦，醒来后却什么也记不清了。我很快就明白了，米书里表达明确，要想熟记它的内容，只有当我读遍所有的篇章才有可能。

1348年6月9日

从上次日记至今，16个月已经飞逝而去。快乐无比的16个月，怀着无法描述的希望的16个月。今天，它却以一件无可挽回的事故而结束了。

今天早晨，我起床后，到衣橱去找我的米书。在搁板上，米袋和分格的盒子都在，但都空空如也……一种可怕的预感使我直奔我平常工作的房间。焦娃娜靠窗坐在老地方，在她的膝盖上，放着一只白瓷小盒，里面还剩下忘记吃掉的米书中的最后一粒米。在这粒被淘洗过，并因煮熟而膨胀了的米粒表面，人类全部智慧只剩下一个字，这个字是“莫”，就是说，“什么都没有”……

不要以为这篇小说仅仅是对中国人精微雕刻技术的赞叹。小说的作者自己说，“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米粒上书写，甚至雕刻，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人能把一首唐诗刻在一根头发上。在一粒米或者一粒瓜子大小的象牙片上刻出《老子》全文之类的情况就更多了。在古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尚且能做出这样的奇迹的中国人，没有理由在当代的科学技术竞争中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在这方面我们是应当有充分信心的。

小说的作者罗布莱斯是一位哲学博士。他在小说中谈的实际上是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和交流问题。

我们国内有一些不争气的中国人，把中国的文化说得一钱不值。照他们的说法，中国就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哲学思想。他们认为，中国人只会“述而不作”，没有任何创造性。中国的传统观念只能起束缚人的思想的作用。因此，统统是糟粕，是包袱，只能彻底否定。中国要前进，只能“全盘西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完全拜倒在洋人的脚下。

罗布莱斯的看法却正相反。他在小说中，除了马可·波罗之外，还引证了12世纪到14世纪间许多人介绍中国的著作，包括普兰·卡尔本，让德·蒙泰·科尔维波，奥多里·德·波尔德诺内，弗朗切斯科·巴尔杜齐，焦瓦尼·乌兹扎诺等等。至于他的小说的主人公，戴维·达什比，他所以“接受到异国他乡来的使命”，则是为使自己“最隐秘的疑虑，灵魂的痛苦”，“得到缓解”。即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那些最光辉的思想，也解决不了他对那些难以解答的问题的困惑。这位杰出的神职人员自己感到，“我已丧失了我青年时代的盲目信仰，我感到我内心的怀疑日益扩大，使我失去了一切凭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米书》，看到了烈火般的真理，感受到了一种完全新的知识。

罗布莱斯没有掩饰他对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到那位不知名的大汗等等封建暴君残酷地摧残文化行为的痛恨。但是，他着力描写的悲剧，却是在这种摧残下顽强地保留下来的文化，最后竟被一个西方的疯女人当作物质的粮食吃掉了。他写了西方人对东方智慧的追求和无法完全理解。他借达什比之口说：“试图将超越语言本身的东西变成英语，而且要重新找到能产生如此众多不同文章的文字和涵义的奇迹，这确实是枉费心机。”他更写了物质和形体上的美和精神美之间的矛盾。罗布莱斯在小说中说，戴维·达什比在14世纪的日记曾经由20世纪初年都灵皇家图书馆馆长朗多尔福·格里马尔迪整理过。这位馆长在他的笔记的最后，引证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地区）一首14世纪的叙事诗，说一个男人在一个精神错乱，但十分美貌的青年女子的陪伴下，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最后这句诗是：“可怜啊，这位绝色的美女，陪伴着那位博学的才郎，在默默的颠狂中，渐渐熄灭了生命之火。”

罗布莱斯这篇小说的写法，是要使一个14世纪的故事和20世纪的现实取得某些联系。他的这篇小说在1982年获得了法兰西学院中短篇小说奖，也多少反映了现代欧洲人对他的观点的欣赏。

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呢？我想，我们还是既不要否定一切，也不要肯定一切，来得更好些。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当然要继承这一笔历史遗产，并且使它们在新的条件下发扬光大。但同时我们也就要抛弃其中的糟粕，对传统的文化加以改造，这样才能不愧对我们的祖先。我们决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写尽了绝对真理，对于外国的文化，只要对我们有益的，我们都不会拒绝接受。在接受的过程中，当然也要加以改造，使它们更适合中国的需要。我们有信心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地进行下去。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悲剧，不会是历史的规律。

欧洲人写的第一本中国游记

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很远的年代。早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就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关于大秦（罗马）的记载。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的文明，中国的许多特产，逐步地传到了西方。

可是，那时候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是很少的。直到十三世纪末年，才诞生了第一部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出生于公元1254年。他的父亲尼可罗·马可和叔父马飞阿，都是威尼斯的巨商。他们曾经到中国来过两次。他们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大约是1271年，这一次，年仅十七岁的马可·波罗也跟着走上了万里跋涉的道路。

当时的中国，正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在位的时候。1275年5月，马可·波罗到达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西北）；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他在中国住了十七年，游历过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山东、云南、四川、江苏、浙江、福建及北京等地。1292年才离开中国，返回故乡。1298年，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进了监狱。他在监狱中，口述了东方见闻，由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难友笔录成书，这就是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描述了中国广阔的领域，丰饶的物产，繁荣的城市，文明的习俗。马可·波罗到新疆的和田，就看到那里的“产品有棉花、亚麻、大麻、各种谷物、酒和其它的物品。居民经营农场、葡萄园以及各种花园。”到了中国的南部，他看到，“在他们的土地上，一年可收成三次”，“他们的土地，凡可耕种的都不让它荒废。”十三世纪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煤是什么东西。马可·波罗看见中国人烧煤，在游记中说：中国“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马可·波罗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磁器的生产方法和桑皮纸，介绍了北京的造币厂，介绍了哈密附近“出产一种具有防火作用的石棉。”马可·波罗说他在九江“看到的船只不下一万五千余艘”，船的载重量，一般是四十万公斤。

马可·波罗叙述了中国许多繁华的城市，他谈得最详细的是汗八里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的元大都。他说，“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马可·波罗谈到了元代中国人对天象的观察。他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观象仪，上面画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和它的全年的几个方位。”利用这些仪器，中国的星占学家“预测每月的特别气象”，其中包括了地震的预报。我们知道，元代的天文学曾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出现了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当时，北京的观象台建在朝阳门附近，到明代才迁到今天的建国门南侧，至今那里还保留着古观象台，由于年深岁久，已经重修过了。

马可·波罗对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感到惊叹不已。他说，这座“美丽的石桥”，“也许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桥长三百步，宽七步；十个人骑马并肩而行，也不感觉到狭窄不便。桥有二十四拱门，由二十五个桥墩支立水中，支撑着桥身；拱门用弧形的石头推砌而成，显示了造桥技术的高超绝伦。”“桥上各石柱之间都嵌上大理石板，上面镌刻着精巧的雕刻，使整

座桥气贯如虹，蔚为壮观。”

当时的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也是站在世界前列的。马可·波罗注意到，中国人“彼此交谈的时候，态度谦恭，相互问候，彬彬有礼，笑容满面，显得很有教养。而且，在饮食方面也特别注意清洁。他们对父母表示最大的孝敬。”在宫殿里，“每个有职位的人，随身携带一个供吐痰用的小器皿”，这种小器皿大概就是“唾壶”。事实说明，七百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认识到随地吐痰是不文明、不礼貌的习惯。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还谈到了中国的城市建筑和管理、运河、邮政、绿化等等方面的情况。

《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大大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一些人根据他的游记来绘制世界地图。更多的人由此引起了对中国的向往。1492年哥伦布远航的时候，就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书信，目的地本是中国和印度，结果却意外地到了美洲。

看了马可·波罗的游记，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祖先的勤劳和智慧感到自豪；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手里，我们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将要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

阿拉伯文献中的中国

古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交通，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作为桥梁。

汉朝的使者甘英出访大秦（罗马帝国），就走到了波斯湾。

中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建立了强大的哈里发帝国。唐代以来，中国人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唐、宋、元三代都和大食帝国有密切的交往。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有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船两条途径，中国的海港，阿拉伯人到得较多的，主要有广州、泉州和宁波。泉州住的阿拉伯商人，多的时候有几万人。

在中世纪，中国的物产，包括瓷器、茶叶、丝绸，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包括印刷术、造纸术、制糖术，都是通过阿拉伯人为媒介，辗转传到欧洲的。

在古代阿拉伯人的笔下，保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记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阿拉伯的文献中，看到古代中国在异邦人士眼中的风采。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描述中国的阿拉伯著作，大概要算伊本·郭大贝在公元846年著的《省道志》。在这部书中，郭大贝记述了从波斯湾向东航行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情景，他记述了中国从南到北的四大港口：瓦景（在越南半岛），广府（广州）、越府（宁波）、江都（扬州）。他说，这些港口都出产米、铁和瓷器。“中国有三百名都大邑，人口繁多，十分富庶。”

对中国的这种类似的称道之词，在各种阿拉伯人的著作中一再出现。直到14世纪中叶，摩洛哥丹吉尔人伊本·白图泰周游了非洲和亚洲许多地方，写了一部巨著《在美好国家的旅行者的欢乐》，也一再说中国国土广大，大汗治理有方，人民生活富裕，城乡经济发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远洋交通中，首先使阿拉伯人注意的，是中国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早在唐代，中国已经能制造大海船。据戴维逊所著《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书中说，当时中国海船结构有多到5层的，船的体积和抵抗风浪的能力都超过大食海船之上。早期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在公元851年留下的游记中说，中国的帆船体制雄伟，货位充裕，航行安全。而当时阿拉伯帆船还只有椰索捆扎，不用铁钉，只是单桅，在远洋航行中容易出事。他说，在南印度的故临，一艘中国船要纳的税是1,000迪尔汉（银币），而其他各种船只，只要缴纳1到10个第纳尔（金币）。阿拉伯钱币迪尔汉和第纳尔的兑换率是22:1，可以算出，中国帆船所纳的过境税至少要高于其他各国船只的4.6倍，可见中国船只所载丝绸、瓷器、铁器、药物的数量和价值。到了元代，伊本·白图泰说中国的大海船可载千人。他说，那时到中国的外国商人，都要在南印度换乘中国帆船。

当时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人，主要是商人，他们的最大兴趣在中国的商品。吸引他们的是，中国富饶的物产和劳动人民精巧的手艺。伊本·郭大贝提到的中国货物有棉布、麒麟竭（血竭、一种中药）、芦荟、樟脑、帆布、马鞍、瓷器、绸缎、肉桂、高良姜。著于公元982年的波斯文佚名著作《世界境域志》中谈到中国出产大量黄金、丝绢、格府绸、织锦缎、瓷器、肉桂、牛角刀柄，“出产一切珍奇异物”。这位作者赞誉中国居民的手艺说，“他们制品的精巧，令人惊叹不止”。

中国的丝绸早就闻名于世。到中世纪，虽然养蚕、织绸的技术已经传到了某些阿拉伯国家，但是中国丝绸仍然被认为是最好的，成为阿拉伯市场上

的畅销商品。由于当时泉州是出口丝绸的主要港口，泉州的别名“刺桐”竟成为元代阿拉伯各地称丝绸的代号。

在中国产品中，最令人倾倒的，还要算瓷器。瓷器既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又往往是精美的美术工艺品，因而在中世纪的阿拉伯成为贵重的礼品。据阿拉伯学者贝哈基记述：在哈伦·拉施德时期（公元786—806年），由于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巴格达进献了20件中国御用瓷器，从而震惊了哈里发的宫廷。查希兹（生于公元779—869年）著的《守财奴》一书中，把中国瓷器写作室内讲究的陈列品。在《印度浪迹者》这本集子中，写过一个犹太商人在公元884年去东方，913年回到阿曼后，因拥有数量可观的中国丝绸、瓷器而成巨富。在他赠给阿曼统治者的丰厚礼品中，便有一件器首镶金极其华贵的深色瓷器。伊本·法基的《地理志》（公元903年出版）曾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灯具列为三大名产。

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瓷器十分赞美。苏莱曼·丹吉尔在他的游记中说：“中国出一种优质的泥土，用来制作杯、碗，透明的程度可和玻璃相比。”这样透明的琉璃制品已经在近来西安附近出土的唐代文物中得到证实。塔里比（生于公元1000年前后）说，中国的瓷器“以杏色的最佳，胎薄、色净、音脆。奶油色的次之。”长期侨居印度的阿拉伯学者比鲁尼（生于公元973—1049年）说，“中国瓷器透明、洁净，如同水晶。”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则认为中国瓷器在当世确是首屈一指的。他说，“中国人是各民族中手艺最高明和富有艺术才华的人民”，“至于绘画，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才能是非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能与之相比”。

在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著作中，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也是十分称道的。

伊本·赛德·哈桑在发表于公元920年的《琐记》中，记述了一位科莱人瓦哈伯晋见唐僖宗的经过。他通过记叙唐僖宗和瓦哈伯的对话，把唐僖宗描绘成一个精通世界历史和国际形势，尊重各大宗教的君主。僖宗曾告诉瓦哈伯，阿拉伯、中国、空厥、印度和希腊是世界上5个大国，其中尤以国土广大的伊拉克（阿拉伯）君主，和人民繁庶的中国皇帝最为尊荣，后者享有“人类之王”的尊号。

苏莱曼称赞中国政府管理侨民的办法。他说，由于伊斯兰商人常聚集在广州，中国便在广州设立了蕃坊，由伊斯兰侨民中推选一人担任法官，按照伊斯兰教规治理侨民。移民区中有清真寺一所，蕃长常和侨民共同祈祷。侨民的宗教信仰，完全受中国政府保护。对于入境的外国商船。征收30%的税额，政府可以高价优先挑运货物，发送京城，其他的货物都由商人自由出售。伊本·白图泰在他著的《在美好国家的旅行者的欢乐》一书中特别注意到元朝驿政管理十分理想，以为“在中国旅行，最为稳妥便利”。旅途中既便利又安全，从广州到北京一路都是如此。

人间仙境

朋友，你到过圆明园吗？

也许，你至少从电影中曾经一睹它今日的面容吧！

面对着那断壁残垣，你是不是想知道这个当年的中华第一园昔日的丰采呢？

可惜，圆明园作为封建帝王的宫苑，一般人无缘入内，也很难留下文字的记载。

可是，也有例外。乾隆皇帝就曾经请过一些西洋教士住到圆明园的如意馆中作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并且焚毁了圆明园。这些侵略军的士兵自然也看到了园中的景色。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点外国人关于圆明园的记载吧。

有一位法国人格兰西，大约也是一位传教士，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其中写到了圆明园。他说：

“这个巨大的宫苑，园地的全部，布置着人工所造成的小山和丘陵。”

“清澈的水泉，是来自宫苑外的高山，灌溉山谷的底部后，即行分散。最后又汇合成大大小小的湖泊。”“有一个巨大的湖，人们称它为海，这一片汪洋大水，位于园苑的中心”，“海的中心还矗立着岩石的小岛，上面建有宫殿，结构极为精美。这小海的海岸，参差不齐，很有风趣，时而深藏为海湾，或伸出成为海峡或半岛。”

他说，“在每一个山谷里，都有依其特有的计划而构造的宫殿。建筑的正面是用圆柱和窗牖(yu)，并涂上金色再加上彩色的髹(xi)漆，墙垣是用灰砖建成，再雕镂上花纹，屋顶覆以彩色的琉璃瓦，红、黄、蓝、紫掺杂配合，变化万千，形成极其美观而悦目的境界。”“仅仅一个宫殿就需要消费库金四百余万佛郎(注：法国货币名)”，“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宫苑圆明园中，大约有二百多座宫殿”。

“宫殿有的建筑在岩石的高处，可以临高下望”，“可以看到用作点缀的桥梁和空谷兰花，绿荫里闪现着金碧辉煌的高大宫殿，庭院中陈列着繁花异卉，小山上的泉水瀑布徐徐的流下，这样美妙无比的景致，真迷人目，令人有置身仙境之感！”

有一位英国侵略军的随军牧师马卡吉写道：

“假若你能够的话，你必须想象一所广大的迷宫，充满着峥嵘参差的山石，景色可以入画，房子俱用上等香楠制成。湖泽池沼，交错其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还有屋顶镶着黄色琉璃瓦的凉亭”。“周围密密层层灌木丛林，名花茂卉，且有琳宫梵宇很多，供奉着奇奇怪怪的神祇。”“宫殿内面，都充满着中国古代的美术物品，美丽而且极有价值。”“嘉木珍林，奇花异卉，形式万般，五光十色，造物所赋与的最好礼物；你还必须添上林木，清泉，山坡，岩石，高岗等等。而且还有擅长布置园林的中国人，其技术闻名世界的意匠经营，极工装点这景色，这处置一块石，那处安一座桥，配合得极其巧妙，一丘一壑，仿佛自然的景色一样。那些美丽的宫殿，疏疏落落的，分置各处，紫檀梁柱当中，隐约露出光灿的屋顶。时而曲折幽径中，又有御苑的麋(mi)鹿，跳跃其间，拦阻你的道路。东零西散的，有几座旧式的中国桥梁，可以使你越过澄清的湖洋的支流。水中有各种水禽等等，游泳潜跃。”“假若你能幻想，神仙也和常人一般大小，此处就可算做仙宫乐国了。”

我从未看见一个景色，合于理想的仙境，今日方算开扩眼界。”

还有一位英国军医伦尼，他写道：

“此园在北京北方”，“在一大片广袤(mào)的园地上，有花园、宫殿、海岸和位于假山之上的高塔。”“具有各种不同的林木，掩荫左右，而于绿叶扶疏之中，将清帝各处住所，黄色的琉璃瓦，隐约现出。且有一片大湖，渊渊其水，浴浴其天，隐在这些林木浓翳的山间。湖中两三岛屿之上，建有景色堪入画图的屋宇，用奇形怪状、美丽的石桥，联络至陆。由湖水的一边，蜿蜒曲折，向高处伸展两哩之远，在山洞和花畦之间，有鲜花的藤蔓遮荫着，即是清帝和宫眷最喜爱散步的夹道。有些地方，宫殿临近水滨，经过其间的便道，就是建在湖滨之上，后面有光泽美丽的石廊，连绵亘延，作为背景。这块地方，在我眼界中，成为最奇特和最美丽的景色之一。”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英法联军的一把火烧毁了，园中的宝藏，也被他们抢掠殆尽。马卡吉写道：“焚毁的命令发下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升腾起来。”“顷刻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不久这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后来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掩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被视为举国神圣庄严之物，……都付之一炬了。以往数百年为人们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能触到人类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的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比拟。”圆明园的建造，虽然是为满足帝王的私欲，但确实表现了中国劳动者的聪明和智慧。圆明园的被焚烧，则表现了中国转向落后挨打的历史。凭吊荒园，抚今追昔，新时代的中国青少年，是会做出自己的结论来的。

强盗的自供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零九年，是中国受屈辱、被奴役、任人宰割的年代。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都把中国看作一块肥肉，谁都想上来咬一口。本世纪之初——1900 年，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组成了八国联军，一齐向中国下手，占领了首都北京城，最后逼迫当时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单是赔款就达到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 39 年付清，加上每年索要的利息，总数达到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现在有些不了解历史的人，错误地说中国的贫穷落后，都是人民起来闹革命闹的。照他们看来，似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应该不抵抗，当顺民，把中国归入帝国主义的版图，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也就会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这种错误的观点，简直是白日做梦，说胡话。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难道是来帮助中国富强的？当然不是。他们来，是为了吃我们的肉，吸我们的血，抢夺我们的财富。

当时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于 1900 年 10 月 23 日给德国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这个强盗头子的自供状。看一看这个自供状，对于认识这些帝国主义者的面目，是大有好处的。

瓦德西先说了一个总的印象：“所有全体市区，多被毁坏”。他说：“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瓦德西在这里写了一个旁注：“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 8 月 16 日至 18 日为止。”抢劫而至于“公开”，而且又是“正式”、“特许”的抢劫，听起来好象是奇闻，但又确实是事实。这样的军队，不叫它们强盗，还能叫什么呢？

瓦德西还说：“其后便继以私人抢劫。”由于是“私人”抢劫，长官们不闻不问，这就没有底了，所以，“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不能查出”。就是说抢掠物资之多是永远也查不清的。

下面，瓦德西分别叙述了在这次抢劫“竞赛”中，各国军队的表现：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都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由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英国真不愧是老牌帝国主义，抢劫居然成了他们的“行军特长”。当时有一位印度籍的英国人说：“凡是兵士所需要的……都是通过派出一队一队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的……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士兵奉命抢劫，赃物归于国家。这样的国家，不是强盗国家又是什么？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看来，美国这个新帝国主义毕竟比老牌帝国主义“聪明”，他们会用口头上的文明掩盖行动上的野蛮，他们表面上有所谓“禁令”，而士兵又能“为其所欲”——想抢劫什么就抢劫什么。试问，没有长官的默许能做得到吗？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

打成粉碎。”“夏宫（指颐和园），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至于冬宫（指中南海），则由于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怎样“保护”呢，“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戏园仓库等等是搬不走的，怎么办呢？”均被横加劈毁”。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关于德国军队在这方面的“战功”，狡猾的瓦德西竟一字不提。事实上德军当时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这些强盗不止是抢劫而已，瓦德西说：“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

这些帝国主义强盗凭什么到中国来胡作非为呢？凭他们的洋枪洋炮，也因为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瓦德西在1901年2月3日给德国皇帝的另一份报告中，叙述了他对中国的观察结论。他说：当时中国的“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出振作有为之人物。这些人——皇太后、皇帝以及昏庸颡顛（m nh n）的官僚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只能做奴才。瓦德西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指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清朝政府的军队成了侵略军的开路先锋，清朝政府成了可耻的卖国政府，历以瓦德西得意地说：“现在余已居然自认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

但是，瓦德西同时看见了另外一个中国，就是中国的劳动群众。他在报告中说：不应当忘记，“中国的领土之内……共有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的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具备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中国下层阶级……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参加了义和团的群众运动。正是这样一股革命力量，使占领了北京城的帝国主义分子，好象坐在火山顶上，胆战心惊，不敢一口把中国吞下去。

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扑到我们伟大祖国的身上来，我们的国家居然没有亡国，秘密就在这些手无寸铁的群众身上。这些群众一旦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凝聚成为无敌的革命力量。重温这一段从屈辱然后走向解放的历史，对于我们在新的条件下怎样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难道不是一种鞭策和鼓舞吗？

伟大的朋友

我们知道，马克思终身没有到过中国。

一直到 1883 年马克思逝世的时候，中国人也不知道世上有一个马克思，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

可是，马克思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他并没有忘记中国。照马克思当时的话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

1840 年，这个帝国走到了一个转折点：英国人用他们的炮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独立的中国开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这时候，马克思还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中国的事情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然而，对于在 1856 年至 1860 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马克思不但发表了十多篇文章，而且他还追溯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两篇论鸦片贸易史的社论。

马克思说：“在 1767 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 200 箱，每箱约重 133 磅。”接着，马克思引用历史资料指出：从 1772 年起，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越来越多，1800 年达到 2000 箱，1821 年增加到 7000 箱，而到了 1837 年，更增加到 39000 箱。

鸦片是一种毒品，人们只要吸鸦片成瘾，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这样，英帝国主义赚了大钱，而给中国造成了什么结果呢？一是“人民堕落”，二是“白银不断外流”，三是“国库完全空虚”，四是发展了“营私舞弊行为”。为了说明英国的所作所为是怎样地不道德，马克思还引证了一位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

“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因为买卖奴隶还须保持奴隶的生命，而不需要“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正是这样一种罪恶的交易，在鸦片战争以后，飞速地向前发展。1855 年至 1859 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激增为平均每年 68500 箱。帝国主义欲壑难填，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国又联合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的借口是非常荒谬的。

1856 年 10 月 8 日，清朝政府的水师在广东黄埔港的一艘走私船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和十名有犯罪嫌疑的水手。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英国领事巴夏礼硬说这艘船是英国船，说中国水师在上船检查时扯下了英国国旗，是对英国的侮辱。由此挑起了争端，并且不断扩大事态，终于成为一场严重的战争（火烧圆明园就是在这场战争中发生的）。由于引起事端的这艘船名叫“亚罗”号，这次事件也被称为“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本来是条中国船，船上没有挂英国旗。根本谈不到对英国旗的侮辱。这些情况，英国公使包令知道得很清楚。他私下对人说：“船当时不在我们保护之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这个英国外交官竟是一个如此无耻的人。

当时，在英国政府的欺骗宣传下，英国国内一片疯狂的叫嚣声。伦敦《泰晤士报》说：“由于这次敌对活动的爆发，现存的各种条约就都作废了，我们大可按照我们的意愿自由自在地和中华帝国安排关系了！”就是说，他们

可以恣意妄为了，“至于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的地方都用不着提起。”

针对这种强盗逻辑，马克思挺身而出，他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逐条地进行了驳斥，他用事实揭露了事件的真相。指出这些英国报刊，“举不出一件确凿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一切诬蔑。”马克思愤怒地说：中国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件控诉，至少可以提出九十九件控诉。”

马克思不但把巨大的同情寄予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而且把希望寄托在中国革命上。马克思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就是论述太平天国起义的。这篇文章写于1853年。他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10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

英国的大炮强迫中国输入鸦片，英国的大炮使清王朝的威信扫地，英国的纺织品使中国的纺织业破产，为了付给英国人赔款而增加的捐税，使中国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鸦片走私使官吏的贪污行为更加发展。这一切都成了人民起义的导火线。鸦片的输入首先是在中国的南方，太平天国的起义也首先是在南方爆发。这个革命不但是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打击，同时也打击了欧洲的帝国主义。中国的革命使欧洲人的鸦片买卖和其他买卖都难以进行，这就必然会使欧洲的经济危机爆发得更快，从而引起欧洲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所以马克思说，“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指中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

太平天国的革命者们，不曾听到马克思在万里之外对他们的斗争所作的这样高的评价。但是马克思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这种真诚而伟大的友谊，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在中国人民以后前进的每一步，都有许多人向我们吐口水、诬蔑、漫骂。但是，同时也就有许多马克思的继承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站出来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甚至因此坐牢和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证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团结和斗争的旗帜，就是由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友人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风暴的新源泉

1924年1月21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停止了呼吸。消息传来，中国广大的革命者和劳动人民同声悲痛。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举行了追悼会。在孙中山领导下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体会三天，以志哀悼。在广州开的追悼大会会有六万人参加，孙中山在会上致悼词，并且亲笔写了“国友人师”作为挽词。从古至今，外国人的逝世，在中国引起这样大的震动，列宁是第一个。

列宁受到中国人民这样的爱戴，是当之无愧的。

当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地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时候，是列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穿了帝国主义的谎言，指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正义性。

1900年，沙皇俄国参加了八国联军，血洗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文化击败中国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传播者使命’在远东的新成功。”列宁在《火星报》的创刊号上针锋相对地揭露说：“这些胜利”，“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了。”

那些帝国主义分子造谣说，这次战争是由于“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列宁驳斥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恨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君主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这虽然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列宁却从这次革命看到了亚洲的觉醒，看到了中国的新生，看到中国革命将要对世界革命发生巨大的影响。

1912年11月，列宁在《真理报》上写了一篇《新生的中国》。他说：“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1913年5月，列宁甚至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知道，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的说法“不合情理”，因为“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他认为这里有一种“辛辣的真理”。欧洲，虽然“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而被人看作是“文明先进的”，但是当权的资产阶级却“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光明和自由”而“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你说，谁先进，谁落后呢？

中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写了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列宁称赞这篇文章反映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他说：“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

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说，可以把孙中山“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两者相比，谁先进，谁落后呢？

列宁看到，中国革命的兴起，必将对世界的前途发生极大的影响。他说，“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而且这种风暴必将反过来影响欧洲。“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列宁并不是没有看见，当时领导中国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动摇的；也不是没有看见，欧美的资产阶级政府都在用尽全力企图扼杀中国的革命。但是，列宁看得更清楚：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诞生了。辛亥革命以后，工人的斗争发展起来了。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的七年间，出现了一百三十多次罢工。列宁指出：“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俄国共产党的名字——作者注）。”

列宁的预言果然实现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今天，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亚洲的东方，向全世界宣告：人民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就不但能在精神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一定能一步一步地改善自己的状况，直到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

两位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关注

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都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他们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母亲》等等，在中国早已是脍炙人口。可惜，这两位伟大作家都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

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充满哲理。他的思考在许多地方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颇为相近。这并不是偶然的。东方文化曾经长时间吸引着托尔斯泰的注意。托尔斯泰感到，在亚洲各国中，在思想上与他最近的是中国。他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写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论文。托尔斯泰说，孔子和孟子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而老子对他的影响则更是巨大的。他甚至自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来源于老子这位中国的先哲。

1906年9月，托尔斯泰曾给中国学者辜鸿铭复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对中国的文化推崇备至。他说，“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向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尽力想理解中国生活中我所能懂得的一切，这主要是中国的宗教的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和对他们的注疏。”

在这封信中，托尔斯泰对当时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和期望。他说，“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将领导着东方各民族起着巨大的作用。”

直到1910年4月，即在他逝世前半年，托尔斯泰还说过：“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

在玛克西姆·高尔基的故居，人们会发现陈列的艺术品几乎全部是东方的，特别是中国艺术品更是多得不可胜计。

原来，高尔基对民间艺术品有惊人的喜爱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他的一生收集了大量的俄罗斯和其他各国的艺术品。但是，这些艺术品最后又被他陆续转送给一些博物馆和朋友们了。留在身边的，则是这些最珍贵的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他常常从这些艺术品吸取创作的动力。他经常对人说，搞写作，就应该象东方艺术那样精雕细刻。

在高尔基的餐厅兼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餐具柜顶部放着的一对中国大花瓶和两个花瓶中间放着的一组黑色中国大型木雕——道教神仙的群塑。

高尔基特别喜欢的一件中国艺术品是用整块象牙雕琢而成的魁星。因为他听说，主宰文章兴衰的魁星是庇护作家和学者的神。而魁星脚下雕刻的鲤鱼跳龙门，又是力量、坚毅、顽强的象征。在他的书桌上，用来压纸的，也是中国工匠雕刻的紫色石英鲤鱼。高尔基的办公室有一套古色古香的中国家具。这是他的亲属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其中包括一张长长的楠木雕花琴桌，两个紫檀木方凳和一把高大沉重的紫檀木雕花椅子。高尔基就坐在这张椅子上办公和写作。

高尔基收藏的中国漆器和景泰蓝中有香炉、印台、桌灯、如意、花瓶，瓷器有茶具、花瓶、温酒壶、盘子。他还藏有中国寿山石雕刻的寿星，16层的大象牙球，以及象牙或玉石雕刻的佛像。在他的卧室中则珍藏着一个精致的中国刻花玉盘。

1935年7月27日，高尔基过生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家庭晚会。高尔基穿着一件红色的中国绣花长袍戴着一顶绣花园帽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可见高尔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在高尔基故居，还珍藏着高尔基 1934 年 9 月 2 日发表的一份《告中国革命作家书》。

“亲爱的中国革命作家同志们！

今天报纸登载了关于中国红军取得了新的胜利的令人高兴的消息。

中国同志们！我们代表苏维埃文艺界祝贺你们取得的新胜利，而且坚信你们将取得对敌人的最后胜利，我对贵国无产者的英勇精神表示钦佩……”

应该指出，当时高尔基得到的消息并不准确。1934 年 9 月正是中国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前夕，被迫举行的长征即将开始。但是，高尔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所表现的热情却是真挚的。这真挚的感情将永远鼓舞着中国的作家和中国人民。

在“北京死了”的日子里

“北京死了，死了。”

这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于1935年12月用笔名尼姆·威尔斯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的一首长诗的第一句。这首长诗的题目叫《古老的北京》。在这首长诗中，海伦·斯诺一再重复了这第一句话。

这时正是“12·9”运动的前夕，距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大约还有一年半时间。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经兵临北京城下了。

早在1931年，日本关东军就发动了“9·18”事变，公然炮轰沈阳城，揭开了大规模武装侵华的序幕。当时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却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1932年2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中国驻沪的19路军奋起抵抗，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是，蒋介石政府却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壓力，于5月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军长期留驻上海。

1933年1月初，日本侵略军攻陷山海关。2月下旬，又进攻热河。3月3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4日晨，日军占领承德，热河全省沦陷。

1933年3月，日军向长城东线要塞喜峰口等地进攻，29军奋起抵抗，蒋介石却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向日本屈膝求和。5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划察北、冀东的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所谓“非武装区”只是没有中国武装，却听任日军自由出入，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进逼平津。

1933年5月2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奋勇杀敌，收复多伦。但在日、蒋军夹击下，冯玉祥被迫离职，抗日同盟军失败，吉鸿昌逃往天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英勇就义。

1934年4月，日本政府发表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1935年5月，日军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特殊化”，要求对华北的统治，逼南京政府将河北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中央军、宪兵全部撤出，并撤换其任命的官吏。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遵照蒋介石、汪精卫的指示，全部满足日军的要求。

1934年6月27日，南京政府又屈从日军要求，命令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察哈尔协定》，把察哈尔省的主权也让给日本。

1935年，日军为策动“华北自治”，经常出动军用飞机，在北平（当时北京的名称）上空盘旋示威。

1935年10月22日，日军宪兵23名率领汉奸，闯入香河县城，赶走县长，囚禁公安局长，成立傀儡政权。

1935年6月，南京政府下达“睦邻敦交令”，书报刊物，一律不准言抗日。

就在这样的时刻，海伦·斯诺，作为一名在中国的美国记者，愤然写出了她的长诗：《古老的北京》。她回忆当时的心情说“1935年底，中国死气沉沉到了极点，这是一个虽生犹死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仿佛空气已腐朽，充满了一氧化碳和腐烂植物散发出的沼气。”

这首长诗发表后，很快被翻译刊载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刊上。下面是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冰心的译文：

北京死了，死了，
无耻的，公然的，和那些
在那失去的战场上，受挫被掠
之后的，温暖裸露的生物
一同死去了，
死了……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
音的，
而这里只有微呻的惨默，
是应当有些生气和动作的，
而这里只有不抗斗的退败，四
肢五脏都冷了。
这里应当有点生气……自然凡
是伟大的帝都，不肯不出
一丝抗斗的声音便投降了的？
这庞大崇高的城墙是不肯的，他有坚厚的铁门，
有箭楼雉堞，二千年来，这城墙
不断的回应着那凯旋者的欢呼。
这里应该有战胜者的绝叫，和那被征服者的叹息
至少也应当有半夜的酸风，为那被忘却的鬼雄哭
泣。
但是没有，这些都没有。
只在日本使馆里有揖让的佩刀铿锵的声响，
只有高高的脉搏般的飞机的声音，在白翼上和平
的画着光明的红日……
在回应着，在回应这些的
只有那熟闻的乞丐的哀啼，
恬然的市贩的叫卖，
以及在北楼上妖狐的怪噪。
放弃城钥的时候，连一点雄壮的仪式都没有；
城钥挂出在铁的城门之外……
没有剧意，没有感情，只有履行日课般的解嘲的
分说。
多么象一出丑戏，这坚厚的中古城墙，划带着胡
虏的古箭痕，
多么象一出丑戏，还有巨翼的黑影在上面覆盖
着！
可是这还不够做那“永远不会演出”的那出戏的
布景。
这里还没有大胆的要求以城中的珍宝来偿还那诡
笑的奸谋，
在这交易场所的地板上也还没有金银相触的响亮
的声音。

但有些地方听得见细语，在严团的门后，在秘密的店里，
那些字眼，是预备将来历史家作为文章标题的字眼：“一定不要有变乱……倡乱的
是土匪……枪毙那要打仗
的土匪！……
产业是值钱的……银行会要倒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产……
这是不容争执的，多么无谓
……让我们要和平与秩序
吧”。
因此，为着眼前的羹饭，她卖
出了她的灵魂，她那破烂
的，不值钱的，卑污的商
家地主的灵魂，
而且假如那买主没有看出，谁
晓得这不是一个公平交易呢？

北京死了，死了
可怜的无望的死了。
呵，你要感到悲痛，看一座端严皇后似的大城，
失去了她的光荣。
因为她被强污，说到她，你要带着愁苦，
如同诗人说到他心灵上城池的陷落。
但是北京并不是被人强污，
不过只象一个白痴妓女的强
污，是被卖也得了报酬的。
而且北京，古老的北京，在她悠久的历史中，
从来没有不挣扎就屈服了的，
北京现在不是皇家的了，她那幽灵出没的宫殿，
用空洞的眼睛瞪视着你，
在那曾是禁城的，皇宫琉璃瓦上的龙檐，
在那一行行黄瓦上的金龙，
看过去又顺懦又老实，
和那秋天的屋顶上，一行行平铺着晒干的，金黄
的玉米上的毛毛虫一般。

北京死了，死了，
一场小说上封建的英雄的时代
都掩埋在无人翻读的古卷纸灰中了。
也没有骑士，旗帜飞扬的驰过通衢，
为防卫帝座，为防卫他们妻子而应战。
这些侵略者既不要他们的妻房，也不伤害他们的
子女。

他们只要一件温善而高贵的东西。
买卖的自由……河北的棉产……公开的市场……
悠长的，清平的，火车与驼运的道路，
为战时的运输，为巨量的鸦片贸易。
为那装箱的货物，不纳税的转运……
严厉的压迫大学里的青年，
不再有五四的激感，关于日本不再有凶恶的言
词……
让我们做朋友，亲善的商人和买办。

何必说什么奴隶与主人？
古老的哈德门大街，从前总是尘土飞扬，黯淡的
充满了灰蓝的衣衫，
但现在却是华繁的和服，许多鲜艳华繁的和
服……
去年是没有的——从前只是黯淡的单调。
这些和服，看过去又新又鲜，夺目的，
如同枯叶堆里长出春花般的惊人。
今天我看见一个日本小孩，用他那光着的、不可
抵御的日本脚趾头，
使劲的踢着一个庄严的山东警察：
他羞愧了——不是那小孩子，是那高大的警察
——因为山东是出中国最勇敢战士的地方……
我就掉头他顾，一边想着，
想着多么奇怪，这雄伟谦和的中国人；这渺小鲁
莽的日本人……
奇怪为什么这里木屐尖锐的步伐
会喧夺了那布鞋的轻柔的踢踏，
遮盖了那街上戈壁骆驼的软步……
在富士山影下东京是美丽的，
在微雾里，在岛雨中，
又素洁，又颤响，又是新建的。
但如把她移放在空漠的北京天空之下，
笼罩了尘土的西山旁边，
我想东京不会有那么美。
似乎模糊的觉到不必需有两个以上的东京，
而坚定的，情感上的重要，必需留下一个古老的
京，
一个死的、麻木的、匍匐的北京，无耻的、唯利
是图的，讥嘲的，练达的，没有胆力也没有惧怕。

海伦·斯诺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她是1931年被美国政府派到中国来调查中国的银元政策的，她在上海期间，经历了“1·28”抗战。她说，“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真正认识蒋到底代表谁。他当时实际上是代表‘买办’阶级的利益”。1933年，她到了北京，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古都，居

然无动于衷地、丝毫不抵抗地落到日本人手中，实在是生气。她说，“我并不想让北京成为战场并被荡平。但我同样不願意，当日本人占领北京时，这座城市却“令人震惊地缄默无声……心灰意冷，肢体冰凉……没有无边无际的壁垒高筑的城市——城市铁门又沉又厚，塔楼雉堞相连……至少要有被忘却的雄鬼在夜风中发生的呜咽悲鸣”（此处根据华谊的译文）。

可见，海伦·斯诺当时还并不真认为北京已经完全死了。她还是满怀希望的。她说：“北京已经死亡，这不是新闻，除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已经死了1000年了。”在她的心目中，五四运动那样的日子，就是这个古都的复活。她是要用自己的诗篇来激动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起来，她认为自己的诗“准确地表达了中国青年当时的感受”。果然，当时看过诗的原作和冰心的译文的梁实秋教授说这首诗“内中感情颇为真挚，是强烈的悲愤，……诗中是以外国人的身份而替我们生这么大的气，我们自己读之能不有愧！”

北京没有死！地火正在运行，它正在集聚力量，准备喷射。就在海伦·斯诺这首长诗发表的同时，伟大的“12.9”运动爆发了。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一年以后，发生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再过半年，也就是1937年7月7日，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开始了。这以后，和整个中国一样，北京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1978年，海伦·斯诺作为一个外国的老妇人重访北京的时候，迎接她的，正是一种新的活力。

红星照耀中国

1936年6月，一个美国人，名叫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的保安县。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驻地。斯诺是第一个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地区进行采访的外国记者。

他是带着一大堆疑问去的。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严密地封锁消息，不断地制造反革命谣言。成百万的军队包围着红军，不停地进行战斗。在外国人看来，红色中国是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的地方。南京政府说，红军不过是一群“流寇”，有些外国人也就否认红军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至于在红军的根据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许多外国人也认为根本不存在，说只不过是共产党宣传的捏造。

但是，许多疑问还是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参加共产党，或者同情共产党，就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了。为什么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要去参加红军呢？据说红军的待遇非常可怜，经常连饭都吃不饱。它怎么能吸引那么多群众呢？红军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工业基地，没有大炮，没有毒气，没有飞机，没有金钱，他们拿什么同国民党的军队作战呢？他们怎么能生存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呢？为什么这样一支队伍能够冲破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完成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达陕北的根据地？他们的领导人是谁？毛泽东是什么人？南京通缉名单上把他列为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二十五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那个价值这么高昂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南京政府好几次宣布毛泽东已经被打死了，为什么他后来又活了呢？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斯诺冒险到陕北来了。

他去了，美联社传出了消息，说他被红军枪决了。正在这个时候，斯诺在保安见到了他要见的人——毛泽东。他看见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斯诺记得，当时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可是他却活得好好的，而且一点也不在乎那二十五万元银洋悬赏要他脑袋的命令。

有一个战士告诉斯诺，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同志穿。斯诺了解到，当红军战士们没有鞋穿的时候，毛泽东自己也不愿意穿鞋。斯诺还了解到，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除了有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

斯诺说，毛泽东住的窑洞，“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他“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而他每天却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斯诺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发现毛泽东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他是湖南人，有爱吃辣椒的习惯，甚至用辣椒夹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

斯诺发现，毛泽东和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地生活着，他就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他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如果群众的愿望和活动是复兴中国的历史动力，那么毛泽东就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历史人

物。

斯诺看到的，的确是共产党领袖人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和人民在一起，代表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当然，要领导革命到成功，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斯诺看见，毛泽东正是“从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他说，“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当时，斯诺每天晚上去见毛泽东，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可是，有一天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斯诺还说：毛泽东“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斯诺说：“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毛泽东详尽地向斯诺询问关于英国工党的情况，很快就使斯诺回答不上来。斯诺还发现，毛泽东对罗斯福、希特勒，墨索里尼、尼赫鲁这些当代的政治家都有很透彻的了解，虽然毛泽东当时的生活环境不过是个四面被封锁的穷山沟。

斯诺说：“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记忆力强，又善于专心致志地学习。”

斯诺把他的采访所得写了一本书，把书名叫做《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一出版就风行各国。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为了不引起国民党注意，改名《西行漫记》。斯诺是美国人，他在书中把毛泽东比作美国的林肯。林肯也是一位伟大人物，是美国解放黑奴战争的领袖，是美国总统当中的杰出人物。在我们看来，毛泽东当然比林肯更要伟大得多。但是，斯诺这本书毕竟是外国记者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第一本书。它帮助了许多外国人，也帮助了许多中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直到今天，这本书对于想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岁月的斗争的年轻人，仍旧是很有用的。

前所未闻的故事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名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文本译作《西行漫记》）中第一次向全世界系统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但是，他只是根据在延安对一部分红军领袖人物的采访写成的。当时，斯诺没有可能亲自到长征经过的路线去作实地考察，也不可能搜集到详尽的资料。斯诺不无遗憾地在《西行漫记》的序言中预言：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

遗憾的是，他在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长征以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另外一个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终于写出了这样一部史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索尔兹伯里是斯诺的朋友。他是美国著名的作家，也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曾经担任过《纽约时报》副总编辑，获得过国际普利策新闻奖，还担任过美国文学艺术学会主席、全美作家协会主席。索尔兹伯里是在1938年通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知道长征的。他说，“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长征抓住了我的想象力”。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尔兹伯里到苏联采访，在莫斯科见到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两位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向他讲了许多新鲜事。当时，索尔兹伯里就急于到中国，到解放区采访。他决定从苏联飞往新疆，再去中国内地。但苏联未同意。他又打算取道印度、缅甸去中国。也因故未能如愿。

新中国成立后，索尔兹伯里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来华要求，周恩来回电表示同意。不料美国国务院不准许。两年之后，他再次提出要求，这时正在抗美援朝战争期，中国方面没有同意他来。

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索尔兹伯里的中国梦才得以实现。他直接向周恩来提出要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当时没有得到答复。他说，后来他才明白，那正是“文化革命”的年月，许多长征老战士正在遭难，要在那时采访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四人帮’如果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并没死心，仍旧不断提出申请，并且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

1983年8月，他的申请得到批准。这时，索尔兹伯里已经75岁了。但是他不顾自己年迈有病（心脏病），怀揣着起搏器，在他的妻子夏洛特（70岁）以及好友谢伟思的陪同下，从1984年4月到6月，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越过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索尔兹伯里说，“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他还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他的《长征》，他的妻子也同时写了一本《长征日记：中国史诗》。

索尔兹伯里的这本《长征》于1985年10月长征胜利50周年前夕在美国出版。“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索尔兹伯里还应邀在许多场合向美国人民介绍长征以及长征以来的中国。会前会后，有不少人在休息室里买《长

征》，并请索尔兹伯里在书的扉页上签名留念。一位老年妇女抱着一摞书请他签名：“这本是我的，这是给儿子的，这本给女儿……”

长征究竟为什么如此吸引了索尔兹伯里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

索尔兹伯里认为，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

索尔兹伯里拿中国的长征同美国、法国、俄国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相比较，他说，“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福吉谷的战斗业绩已铭记在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心中。在度过了那次严峻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宫。当时巴士底狱中仅关押着七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进入冬宫则易如反掌。因为冬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在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成了革命的象征。”

“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先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当代中国，中国的革命，想了解共产党，党的领导人，了解毛泽东，你还得回到长征时期——这个关键年代中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党，以及红军这支中国历史上最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在经历了那一场严峻考验之后而成长壮大起来的……今天这支力量又领导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个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

事实上，中国今天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又是一次新的长征。从根本目标上讲，从根本的指导思想讲，它都是那一次长征的继续。索尔兹伯里认为，虽然“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很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

有些人总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对于长征，也有人力图否定它的意义。五十年前，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就把长征说成是红军的“逃窜”，是“流寇”行为。到八十年代，还有人认为长征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千多年前唐朝的玄奘就进行过同样艰苦的“长征”。

对于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的行为，我们历来是尊重的。它对于促进东方两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红军的长征，作为决定当代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史诗，仍旧是不可比拟的。

索尔兹伯里在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中说：“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索尔兹伯里认为，“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象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象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在本书结束的时候，索尔兹伯里又写道：“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这不是索尔兹伯里一个人的看法。就在索尔兹伯里这本《长征》出版后不久，又一位71岁的美国女作家琼·弗里茨来到中国，为给美国少年儿童写一本关于中国红军长征的书搜集材料。她说：“我认为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幕活剧。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把长征中红军为了生存、为了中国的新起点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品质以及在困难环境中互助友爱的集体主义精神，介绍给美国少年儿童。这种品质和精神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由于存在着意识形态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美国少年儿童能理解和接受这样一本书吗？弗里茨夫人说，“当然，必须提供历史背景，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会发生长征那样的事件。”她认为，“美国青少年现在对历史特别是别国的历史不大关心，了解很少，这个现象不好。”她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开阔他们的视野，引起他们的思考”。

现在，索尔兹伯里又在着手写一本新的著作——中国的新长征了。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期间来到中国收集材料的。他说，“新长征可能要比当年红军翻越贵州崇山峻岭困难得多。”索尔兹伯里注意我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他说：“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当年长征时老一代领导人相比，他们有明确的目标，他们知道中国应该往哪里走，从经济、技术上来讲，他们要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索尔兹伯里认为，“由新领导人率领的中国将以新思想、新技术、新方式去进行新长征。当然，他们也会碰到新的问题，我并不是说他们要与过去传统断绝关系，我的意思是他们面临的新任务有点象当时中国红军长征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未知世界。但和长征那一代人比较，现在条件要好得多了。当时的目标是要革命，或者具体说，最近的目标是要使自己生存下来，红军长征初时连地图都没有，要整个地确定前进路线或方向是很困难的，他们从江西根据地出发，去走向一个比较模糊的目的地。”

他认为，“今天的困难，主要是因为需要学习新的技术，要学会新的社会组织方法，要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联系。如果一个社会还是初级阶段，那么教会农民种庄稼或士兵如何掌握射击技术，这是很容易的。但是，现代

技术使得战争可能发生在几百英里之外，而指挥员则在电脑指挥室里操纵全局。日前我参观了首钢，那里的工人已经很少，实现了高度自动化，这都需要人去学习和掌握，而且需要非常强的时间概念，不能老是用‘明年’或‘下个月’来计算，而是应该用秒，甚至千分之一秒来计算。”

“今天，现代世界出现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危机，如唐山大地震、东北森林大火和华尔街股票行情大跌，一旦遇到危机，需要毫不犹豫地做出反应。我们都彼此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共同只拥有一个世界，在经济、科学、军事等方面，都需要确立一个新的时间观念。中国已经在开始摆脱那种陈旧的时间观念，并且已在超导体等一些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要把在先进实验室取得的先进技术普及到十亿人的社会中去，这无疑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巨大工程，它是对人类想象力的一种挑战。”

索尔兹伯里将要写的这个新长征，归根到底，将要由新一代中国人去进行，只有今天的青年和少年，才能一直到下个世纪仍然担任这次远征的主力军。怎样来回答索尔兹伯里提出的问题，就要看这一代新人了。在你们手里，应当有更多的前所未闻的故事被创造出来。

“ 伟大的道路 ”

1937 年 1 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进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根据地延安。在那里，她第一次采访了朱德总司令。

在这以前，史沫特莱已经在中国住了七年。在这七年里，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不断地把“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放火犯”、“强盗”、“土匪”等等名称加在朱德将军的头上。这些话，史沫特莱听得够多了。可是，这也使她考虑：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竟能吸引千百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献身呢？

现在，她有机会来会见这位伟大的人物了。她想起过去听到过的关于朱德将军的种种传说，带着好奇心，踏进了他的屋子。

映入她的眼帘的，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身穿蓝灰色棉制服、面色黝黑的老人。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已经洗得破旧褪色。史沫特莱觉得这个人很象中国村子里某一位普通的农民老大爷。

后来，她又发现，尽管反动派曾经为朱德的头悬赏过巨款，他却自由自在地在延安到处走动，而且不带警卫，不带武器，随意走进人家的院子，和老乡闲谈，抱起小孩逗乐。他的军阶相当于美国的五星上将，他却全无薪水，衣履简朴。

史沫特莱还知道，朱德曾经在旧军队里当过旅长。他是怎样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他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史沫特莱被这些问题吸引住了，她用了自己后半生的力量来收集有关朱德将军的资料，为他写了一本传记。

朱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的家庭里，他生于 1886 年 12 月。他的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六个男的，两个女的。因为家里太穷，养不起，小的五个生下来后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朱德幼年也经常吃不上饱饭。可是为了希望有一个“读书人”能保护家庭的利益，朱德还是被挑出来上了私塾，后来并且考中了秀才。但是他没有在科学的道路上走下去，而是对新传进来的资产阶级“新学”发生了兴趣，先是进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教员，后来又投笔从军，进了云南“讲武堂”，参加了辛亥革命和以后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起义。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把皇帝推翻，中国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各个地方增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革命成功了，又失败了。朱德开始重新寻找救中国的道路。1922 年，朱德到了上海，从报纸上看到共产党以及工人运动的消息。他决定要求参加共产党，也见到了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可是，朱德入党的要求被拒绝了。

朱德带着失望的心情出国。他在法国打听到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消息，又赶到德国，在柏林见到了周恩来。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位佃农家庭出身的军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朱德参加了北伐战争。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朱德又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他带领一支部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一直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敌人对他闻风丧胆，而他在老百姓面前又是那样和蔼可亲。怎样

理解他的性格呢？

史沫特莱记下了朱德在长征路上的一段演说：

“过去，个人英雄凌驾在群众之上，轻视群众，甚至奴役群众。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一种新型的，完全是为着中国人民的英雄人物在中国诞生了。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心，也获得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心。她要求朱德把自己的生平告诉她。朱德问她为什么。她说：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是的，朱德走过的道路，也正是千万中国人、千万中国农民走过的道路。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这条路，那条路，都试过了，都走不通。直到找到共产党，人民翻身做主人才有了希望。虽然还有不少困难，有不少牺牲，也还要走弯路，犯错误，但是道路总归是打通了。

史沫特莱只在中国解放区生活了一年多。但是，从此她的心就一直向着中国人民，向着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在美国政府反动政策的迫害下，她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写作《伟大的道路》，直到她生命的终结。她是1950年逝世的。她在遗嘱中要求在她的葬礼上奏出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并且要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中国。遵照她的遗嘱，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的八宝山烈士公墓。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译本也终于在中国出版了。虽然她的书只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怀疑：中国人民正继续行进在革命前辈开拓的伟大的道路上。

“中国震撼世界”

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横渡长江。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

从4月20日到21日，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等竟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向我军开炮。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在镇江附近的江中。

一位外国记者报道说：当时还有另一艘英国驱逐舰伴侣号从南京沿长江下驶，也被共军炮火击退。还有两艘英国军舰从上海上驶，这真是不仅狂妄而且愚蠢，这两艘军舰也受到共军炮火痛击，只得掉头而逃。英方共死水兵四十四名，伤八名。

这件事，大大出乎英国军官们的意料，因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总以为中国人民是好欺负的。

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这个日子很有可能永垂史册，因为在这天，刚刚学会使用缴获的美式装备的中共炮手轻蔑地把英国皇家海军撂到了一边。”

当时正在中国采访的一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认为：“这家报纸还可以补充一句说，这一天也很有可能作为在亚洲敲响帝国主义丧钟的日子而载入史册。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

贝尔登并不是共产党人，他觉得“这个新时期的情况究竟是好是坏还难以断定”，“但是一个古老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事情明摆在那里！贝尔登写道：“三十年以前（就是说，如果发生在1919年），只要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而在三十年后的1949年，帝国主义想要帮助中国的反动派来镇压人民，已经无济于事了，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在人民军队面前逃之夭夭。

怎么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呢？贝尔登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不到四年以前，“蒋介石的地位看来十分巩固。当时他统率着四百万大军，其中三十九个师是美国帮他训练、全部美械装备的。他的空军在亚洲大陆是首屈一指的。过去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全被他囚禁或制服了。唯一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是八年前被他围困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窑洞里，几乎被他消灭的一伙共产党游击队。”

1946年，中国的内战爆发的时候，有相当多的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要想打败有美国人撑腰的蒋介石的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时，上海的美国商人给已经回到美国的贝尔登写信说，蒋介石的军队装备精良，士气旺盛，“共军是打不赢它的，战争将在几星期内结束。”

可是贝尔登没有相信这些胡说。他从1933年开始，在中国住过九年，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腐败记忆犹新。他决心再次到中国来看一看。1947年，他进入了刘伯承将军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会见了薄一波、杨秀峰等许多领导同志，深入到穷乡僻壤，亲眼看到了武工队到敌后的袭击活动。由于他能说汉语，自己又做过海员，在和劳动人民交流思想时的困难比一般外国记者少些。

贝尔登采访了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原来是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的许多知识分子干部，更采访了许多被地主、汉奸、还乡团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农

民。正是这些农民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力，从他们当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来。他看见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力量源泉。他把自己的见闻写了两篇稿子：《锄霸》和《石壁村》，寄给美国一家全国性的杂志。编者回信说：“写得好极了”，“堪称足下最佳作品”，然而却不能发表。

后来贝尔登离开解放区，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那时，在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率领下的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黄河。美国《时代》杂志驻南京的记者却声称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军队没有根据地不能打仗”。这也是当时许多外国人的见解。他们认为“共军渡过黄河只是溃逃，或者不过是袭扰一下。”

于是，就在这些外国观察家的眼皮底下，一件他们不能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的事实发生了。用贝尔登的话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昔日中国内地的小股游击队本来只是一群亡命之徒，现在已成为争霸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演员。”当然，贝尔登对中国人民的了解还不透彻，他不知道我们无论发展到怎样强大，也不会到世界上去称霸。但是，他看到“中国人民几乎还是第一次挺起胸膛，探索未来问题的答案了，”“由此而迸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无情地横扫一切残余的东方中世纪式的野蛮现象，以及西方帝国主义伪装文明的野蛮现象。”他是看对了的。贝尔登把他们所见所闻写了一本书，题名《中国震撼世界》。他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这一切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是怎样来的，了解人民的力量一经发动和组织起来是怎样的不可抗拒。

是的，这一切都是应当永远记住的。

唯一不受危机影响的大国

前些年，在我国国内，有许多人爱谈中国存在着危机。据说，有三个危机：一个叫信任危机——说党的领导干部“异化”了，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第二个叫信心危机——说中国的事情弄不好，“四化”搞不成；第三个叫信仰危机——说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总而言之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却相当普遍地表示羡慕。有这样看法的人，不但是劳动人民，而且还包括了一些有见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1983年11月，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举行了一次经济论坛。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前途的报告。他在列举世界上各大国遇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同时指出：“我们看一看北京，这是根本没有受到我刚才谈到的一切危机打击的世界上唯一的大国。”

要知道，施密特是在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出现了所谓“复苏”的情况下说这一番话的。这些国家，近几年一直处在经济危机之中，到了1983年，总算降到了“沟底”，开始重新回升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施密特这位西方的著名政治家，为什么对于他们自己的事情那样没有信心？

因为事实是，他们的回升不但是微弱的，而且是脆弱的。拿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被称为“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说，1983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只有0.5%；失业人数据1983年11月统计，已达到1230万人，而且还在继续上升。日本算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势最好的国家，政府的赤字也高达100万亿日元，很难有力量采取进一步刺激生产的措施了。

和他们的情况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当然是引人注目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就是1979年以来，中国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按照第六个五年计划的要求，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要从1980年的7159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871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三年来执行的结果，到198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就可以达到8900亿元左右，提前两年达到了1985年的指标，平均每年增长的速度达到了7%以上。在1978年以前的26年中，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增加108亿斤，棉花总产量每年平均增加66万担；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年，粮食平均每年增加260多亿斤，棉花平均每年增加700多万担。198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7400亿斤左右，棉花达到8000万担以上。

在连续八年安排大量青年就业以后，1983年1至10月，全国城镇又安置了待业人员260万人。

中国的欣欣向荣，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1983年来华旅游者达到947万人次，比1982年多150多万人次。为什么中国没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施密特说，“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几乎根本没有统一到世界信贷市场上来”。

他的话又对又不对。说中国和国外的经济交往还不够多，这是事实。但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中国的经济闭关自守，可是不但没有什么活力，而且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国外的经济交往比那时候多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仍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又是什么道理呢？

原来，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会不断发生经济危机，有一个根本的原因，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开工厂，开商店，目的都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赚钱。工厂的产品卖出去，只有一小部分钱变成工人的工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资本家的利润。这些利润却并不全部投到市场上去买消费品。这样一来，生产越发展，商品越多，就越卖不掉。降价吧，资本家的利润受到损失，他们又不干，他们宁可把牛奶倒到河里，也不愿廉价卖给失业的工人。结果就是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增加，市场更加萧条。这就叫做经济危机。资本家的利润用到哪里呢？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就要更新设备。但是老设备还没有磨损，买了新设备，让老设备闲着，他们又觉得不上算。于是，有些钱就只能暂时存在银行里，不能及时变成机器和产品。这样，生产的发展还能快得了吗？

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

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种产品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出一种新的需要来。所以，在我们这里，除了发生工作上的失误，并不存在资本主义世界那种经济危机。

说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中国一点没有影响，那倒也不是事实。但是，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基础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有的产品卖不掉，如果是对我们有用的，我们可以乘机买来。如果他们不卖给我们，我们也不怕。过去，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封锁了我们多少年，我们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等还不是自己搞出来了！我们也出口一些产品，换得外汇，向他们购买对我们有用的先进设备。他们的市场萧条了，我们也不怕，中国有十亿人口，本身的市场就大得很。

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中国的经济今天还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落后。但是，凭借我们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奋努力，我们可以迎头赶上去，不但距离正在缩短，而且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事实证明，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还是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还是马克思主义解决问题。当然，施密特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不会直接承认这些结论的。

风景这边独好

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有些人对外国的情况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只凭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想象，就以为外国一切都比中国好。我们说，国各有长短。外国确有比我们先进的地方，我们应该学，应该赶。但是，不应当灭自己的威风。以为我们样样不如人，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中国对他们也是很有吸引力的。

这一次，我们既不选那些著名学者的长篇大论，更不选那些和中国有长期友谊的所谓“亲华人士”讲的好话，只是随便摘一点普通人，包括对中国不很友好的人的观感。

有一位意大利青年，名叫马尔科，他在上海一所大学里学习了一年中国语言和文学，回到意大利以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他说：“中国的魅力。我为这个遥远国家的思想所吸引。”谈到对中国人的看法，他说：在中国“认识的人越多，就越有亲近感，而没有西方那样冷酷无情和漠不关心的感觉。”

的确，就思想和道德领域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确是令人羡慕的。我们自己认为，经过十年内乱，社会道德风气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至今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水平。但是，和那些西方国家比，还是不知要超出多少倍。

从生产的发展水平说，我们比欧美许多国家还差得远。但是如果看发展的趋势，他们的境况就不见得好了。美国 1983 年度的赤字就有 1,954 亿美元，美国的私人债务已经超过 5000 亿美元。我国 1983 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982 亿多元人民币，创历史最高纪录。这年年底的储蓄存款比年初就增加了 217 亿元。1983 年全世界粮食减产，中国则又是一个大丰收年。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许多外国人的思索。

我们说，我们国家还很穷，1980 年平均每人每年的国民收入只有 200 美元多一点。一个英国记者来中国考察以后说，不对。他认为，由于中国物价低，贫富差距小，实际的水平应该乘上五倍，也就是说相当于外国 1000 美元的水平。也许他把我们的力量夸大了。但是我们这几年进步很快则是事实。

希腊《卫报》记者伊·卡拉普萨拉卡斯说他在中国看到了七个变化：一、“国家把关心人民的需要问题放在首位”。二、农村实行责任制，“人人卖力干活，许多人家盖房子，很多人家年收入超过一千美元”。三、城里“设有自由市场，农民可以随便去买卖”。四、“对优秀的工人、职员实行精神和物质奖励制度。国营商店都力争多卖东西”。五、“妇女的衣着越来越漂亮了”。六、“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处在同一行列里了”。七、“过去，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为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而奋斗；现在，想别的了——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和摩托车”。他认为，这些变化“使中国人民面带笑容和充满自信”。可惜，在中国还有许多人，虽然生活在这些变化之中，却没有看到这位希腊记者看到的变化，更没有看到他从中得出的结论：

“邓小平是伟大人物，是建设现代化中国新精神的倡导者，是政治理论家和忠于党而有能力的实干家。”中国领导人“一定能领导中国在进步的道路上前进。”

应该说，不仅是中央，而且各级都有这种既有革命理想又有实干精神的

干部。英国记者戴维·博纳维亚在 1983 年 8 月访问了地震以后重建的唐山市。他在报道中就说，“唐山市的领导者们看来是一批严肃认真、讲求实际的实干家。他们的心里装着建设唐山的美好愿望。”博纳维亚知道，1976 年的唐山地震，“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灾难之一”。“地震之后的唐山，象日本的广岛被原子弹炸过以后一样，满目疮痍”。然而，当博纳维亚到唐山采访的时候，“置身唐山市的中心，环顾四周，在大约 30 英里的范围内，你几乎看不到一座七年前的建筑物，纵然是该市周围的农村，你所见到的房屋也全是新的；有些房屋的墙壁上还画着中国的传统壁画，房顶上点缀着彩色的陶瓷瓦”。他说，这是“废墟里飞出的金凤凰”，“唐山人所建设的，正是 21 世纪初的中国所要具有的容貌”，“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社会主义的未来的图画”，这种未来的社会主义是能够实现的”。

博纳维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整个中国大地，都在为实现四化一片繁忙。有一位泰国《星暹日报》的记者，特别注意中国开发大西北的深远意义。他说“大西北包括内蒙古，约占中国面积的百分之四十，而人口尚不及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新疆有三座大山，三大盆地，十多条河流，浩瀚的戈壁滩，发达的山岳冰川，蕴藏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加上海拔不高，日照长，幅射强，积温高，温差大。”“象这样各种条件具备的地方，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在世界现知的一百几十种矿藏资源中，内蒙古已探明近百种，七十一一种有相当的储量，其中有三十五种已开采利用。”如果这些优越的条件都得到开发，中国四化建设的步伐，怎么会不加快呢？

这位泰国记者看到，开发大西北，不但已经受到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各类专家纷纷往西北“智力支边”，而且“在青年一代中出现了建设大西北的思想发动”。全国青少年响应团中央的号召，采集草籽、树种，送到甘肃的已经有上千吨。青年人把心和祖国的未来连在一起了，我们伟大祖国的金凤凰还怕飞不起来吗？

一个大学学生的思考引起国外的反响

《北京日报》1986年12月8日刊登的一位大学学生的文章经过《北京周报》转载后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注意。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思考》，作者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83级的学生史玲。史玲在这篇文章中真实地描绘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轨迹。他说：

“过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青少年，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有一种崇拜的心理，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突然‘开放’了，……开始是好奇、惊异，接着就是比较、思考。”

“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糊涂了。”

“就拿一般吃穿用来讲，电视上西方国家家庭生活的‘现代’程度让人简直无法想象。更不用提航天飞机、电脑、机器人、高效率的企业管理、高工资、社会福利保险那些方面了。”

“再看社会主义各国，几乎没有哪家不出麻烦。我们‘十年动乱’的恶果有目共睹，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经济困难或政治动乱，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侵略柬埔寨……”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思考：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社会主义又怎么啦？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是遇到了‘危机’？它‘过时’了吗？”

史玲在听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课，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之后，“渐渐地从迷雾中走了出来”，看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认识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史玲的文章在《北京周报》英、法、日、西等文版发表之后，许多外国朋友，分别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写信到编辑部来，希望通过编辑部向中国的大学生转述他们的意见。

一位利比里亚的读者杰·拉·坦巴写道：“我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谈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他说，“从史玲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西方的技术涌进了中国。当电视屏幕上播出西方的所谓‘现代生活’时，一些中国大学生‘震惊’了。有的人陷入幻境，犹如一个乡下人第一次进入大城市，于是产生一些错误的推理。”

他提醒中国大学生注意，“美国是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奋斗，才变成今日世界上的经济巨人”。“我们相信，只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继续得到巩固，那么可以想象，中国在八十年或一百五十年里，可以取得美国在二百年或三百年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今日的欧洲，处在空前严重的危机中。然而，有些中国青年对此种情况却全然不知。”“应当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大军、恐怖主义、暴力、武力入侵、干涉别国内政，以及中东的动荡、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比勒陀利亚的种族歧视等等问题。”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合作。”而过去恰恰是资本主义封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战略之一，就是在经济上孤立中国。他们想使中国人民改变方向，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这是因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做历史的主人这条道路。”

而“中国正是用行动揭穿了他们这一伎俩，并向全世界指出，依靠自力更生，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可以战胜困难，取得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很好的证明”。

坦巴说，“历史不能责怪青年人，因为他们太年轻”；但是，他“希望中国的青年学生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时，应翻阅一下有关世界经济的某些资料”。

新西兰读者艾利克·奥斯勒指出：“在中国电视上所看到的美国、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那些收入较高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不能算作对资本主义的充分的调查。至少还应该对印度、玻利维亚、南非、智利、巴拉圭、斯里兰卡、秘鲁、印度尼西亚等国——简而言之，即对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情况作一番调查。”

奥斯勒还希望“中国的大学生应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例如列宁写的《怎么办》，以及列宁著作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对比的论述。”他说，“假如一个人没有学习过马克思主义，那他怎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呢？”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民的生活比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好一些；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剥削，从非常落后的困难中起步，现在虽还没有赶上美国，却超过了长期被剥削，但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印度。”

我们国内有些青年人往往爱好横比（实际上也并不了解横比对象的真实情况）而不爱竖比。奥斯勒则认为，“最好的对比应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同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而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应当了解“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对中国的掠夺，资助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他希望“告诉中国与史玲开始的想法具有同样想法的人，只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够，和对充足的事实调查了解不够，才产生了中国目前青年中的那种‘西方最好’的想法”。

美国的乔治·斯·托尔梅则认为“史玲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和历史问题的时候，显然还遗漏了大量重要事实”。

他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是1931年开始战争的（“九一八”事变），欧洲是1939年，美国是1941年（在美国本土上实际上没有战争）。如果从中国遭到攻击的第一天算起，所有丧失生命的人的总数会达到2000万。这个数字比目前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

“突然的进攻使无数经济财产遭到毁坏，同时也把必然与此相关的经济基础摧毁了。”

“中国经受了更多的战争苦难。但内战使它摆脱了封建地主的统治，1949年新的生活开始了。”

“今天，十亿中国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政府关心他们，大学生们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

“难道这些大学生们还不知道中国经历过的可怕历史吗？”

那么，对于有一些国家在战后发展得更快一些，怎样解释呢？

托尔梅说：“世界上有些地区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破坏，这些没有被破坏的工业和经济地区，有可能挑选一些地区，帮助其加速某方面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威胁’，甚至促使一些反共地区有了发展。”

他认为，在那些社会里，存在的是“一种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在那里，

有的人变得富有了，有的人没有”。“假如你把多数人手中的东西给少数人，那少数人的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这就是当今世界全部危机所在。”他问道：“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这不正是封建君主的所作所为吗？这难道不是由于需要使人们惧怕和无知，才能使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存在下去的那些阻碍发展的东西吗？”

托尔梅特别提到文化问题。他说，“富国的地主有时为了自己的暂时需要而提倡一种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是反对知识分子的，反穷人利益的，主要是为了追求享乐，追求时髦。这种文化是为了缓和的不平等社会秩序引起的紧张局面。”

“许多人因吸毒和酗酒而死亡。另外一些人由于憎恶学习，只想跳摇摆舞和听摇滚乐而丧失前途。他们将变成可怕的一类人，他们是会后悔的。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损害了，破坏了甚至是否定了一个人对社会秩序中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要求。这是一条滑向深沟的路。”

他提醒我们注意，“西方的流行文化，在浮华的后面是极其的自私、残忍和只为个人打算。大量的杀人犯、自杀者和毒品，使这种文化滚滚向前。谁都不应忽视这些事实，谁也不应忽视这种孤独，即使在群众之中；也不能忽视那种绝望，即使在不公平的社会秩序的镀金的囚笼里。”

但是，有些人说这就是西方的“民主”社会。托尔梅说，这是“有些家伙需要利用民主来随意引诱更多的人走入歧途。”这种西方式的“民主”，“有一种倾向，会变成十足的掠夺性和享乐主义的烟幕，变成对经济和国民生活缺乏责任感。”

他认为，“社会主义不应是僵硬的，而应是灵活的。当人们的工作、创造性的思想得到赞赏时，便会得到真正的欢乐；当社会积极提倡好的思想和情感时，才会有真正的欢乐，即使人民和国家还比较穷困，但这也是‘天上乐土’的开始。”

“如果正确地对待人民，他们就能够忍受更多的艰难困苦。他们可以从一个彼此互助友爱的社会环境中获得幸福。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他希望中国的“大学生们应该了解人类由于私欲和掠夺战争所经历的悲惨历史。他们应该就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发展国家而开展民主讨论。”

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他说，“一个国家处在无政府状态下，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庞大警察机构。我们需要有出售海洛因的民主吗？需要有役使奴隶的民主吗？需要有抢劫、侵犯人身、破坏……的民主吗？”

托尔梅最后说：“拯救中国的不是那些自私的追求时髦的人。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的一位伟大诗人的崇高诗句，看看是谁拯救了中国：他们在呼唤：在血迹未干的沙土上，人民的心在前进，如一颗星在燃烧！如此众多的生命牺牲了，这是永远不能被抹掉的，而真理和忠诚永在。中国为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希望和理想万岁！”

听听这些“异国之音”，我们又会有些什么反响呢？

中医中药面临的挑战

一个中医中药热正在国外兴起。

长期以来，中医中药在西方国家是被医学界瞧不起的。

一把草，一根针，讲的是阴阳五行，气血营卫，人们认为这太神秘，没有科学根据。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的大门打开了。西方学者亲眼看到中国人用针刺麻醉进行手术。突然发现了中医这一古老医学的神奇疗效。紧接着，美国、英国、法国、西德、荷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中医和中药。

荷兰花了10万美元建设了第一所针灸教学、应用和学习中心。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可以在那里学习针灸并取得中医正式文凭。一位患瘫痪已有7年的病人，被人抬进诊室来，经过14个疗程治疗，又能驾驶汽车了。这个中心还没有登广告，就有300人左右（包括比利时和瑞士的医生）要求参加训练班。

意大利建立起国家级的中医研究机构。

1985年，有7万名日本医生使用中药或针灸作为西医疗法的补充。而在1970年以前，大约只有200人这样做。

伊朗卫生部长马兰迪访问中国回国后对报界发表谈话说，伊朗准备引进中医，借此恢复伊朗的传统医学。他说已经邀请了中国第一流的针灸大夫来伊朗工作，行医治病，同时培训伊朗大夫。消息一传出去，中国大使馆就接刻不少电话，有的要求接受培训，有的要求中国大夫一到就为他治病。

世界卫生组织聘请中国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肖培根担任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

日本大正制药公司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签订了合同，双方联合对中国的药用植物进行研究，以便研制新的药品。

中医中药受到重视，根本的原因是它的疗效好。许多西医西药治不好或者很难治的病，被中医中药治好了。

中国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有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临床效果，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曾经发挥并在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医药学不但有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这样一系列重要著作，而且从公元六世纪中开始，我国隋代就开设了“太医署”，成为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开办的医学院。它既是当时最高的医学教育机构，同时还担负一定的医疗职能。到了唐代，太医署逐渐形成分为各种专业的完备的教学和考试制度。历代许多著名的医生也各有自己一套严格的授徒方法。这使得中医、中药方面，二千年来不断地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

中国有丰富的中药资源，迄今可以确定的中药材有5000多种，全国有400多万亩种植中草药的土地。目前，全国约有800所药厂每年生产3000多种中成药。

中国的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不断吸收海外的医药学成就。例如，五代时的词人李珣是波斯人的后代，他写过一本《海药本草》，介绍波斯的药材。据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就曾借鉴过李珣的这部著作。

中药还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副作用一般比较小。这是西方许多化学合成的药物远远不能比拟的。

在常用中药的基础上开发新药是一条捷径。发达国家搞成一个新药，一般需 10 年时间，花费 2000 万至 5000 万美元。而在常用中药的基础上开发一个新药，几百万美元即可，时间也短得多，所以世界上有不少大药厂正把目光转向中药。例如，联邦德国有一家药厂成功地从中国银杏树叶中提炼出一种治疗脑动脉硬化的特效药，几年间成为欧洲最热门的药品之一，创造了千万美元的年产值。

更重要的是，中医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和西医截然不同的理论体系。美国波士顿一家专出中医药书籍的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东方医学博士卡普恰克的新著《没有蜘蛛的蜘蛛网》。他把中国医学比做一张蛛网，编织得很巧妙，却找不到织网的蜘蛛。中医学是一种有效的武器，人们能够使用它，但尚不明了它的原理。他的这种说法，代表了相当多西方人士的见解。卡普恰克在书中写道：“传说有个中国农民，在一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的医院里做后勤工作。他退休回乡时，带回了一些注射剂和抗菌素。家乡人有病时，他就给病人注射一针抗菌素。有些病人的病竟被他治好了，而他本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而今天，西方的针灸师正在做着和这位中国农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情。针灸术和抗菌素都具有强大的威力。但西方针灸师对于中医深奥的道理和中医巨大的潜力，几乎一无所知。”

还有一位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是真正的科学呢？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代中医学似乎没有什么科学之处。与此相反，古代中国医学中充满着史前的神秘色彩，有时简直让人不能理解。然而，人们一旦了解了它在临床上的极大效力时，那就怎么也不会否定它的价值的。

卡普恰克认为，中西医学的基本区别是：西医对人身的全面状况不够关心，而只对局部有兴趣。同时，西方的医院是按照一个“健康工厂”的结构组成的。而中医学则不然，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中医在诊断一种疾病时，认为该疾病是人的整个身体和心理状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在治疗上尽最大努力把人作为整体全面医治。对比之下，西医追求的是象激光束一样的准确性，把治疗目标对准人身体的最小部分—组织、细胞，乃至脱氧核糖核酸分子。西医的主要缺点是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对于那些因身体和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产生的疾病，中医疗法更为有效。由于中医强调整体和谐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它能够有效地治疗那些用最先进的诊断手段也不能检查出来的人体不适。

随着中医的神秘外衣被慢慢地揭开，国外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正在日益加强。有几个国家正在合作研究用“九里香”来制作一种新的妇女避孕药。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的环球贸易公司正出资帮助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对中医资料进行整理分类。

在这方面付出努力最多的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他们的学者应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释中医，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进行诊断，来同中医的“望、闻、问、切”的结果相对照。在确诊后，再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比如，针灸治疗肢体麻痹病人时，先通过电脑设备来显示图象，以观察患者血液循环改善的情况，借此进行分析、鉴别、比较，看哪些针法的疗效最佳。对中药的制作，他们也进行大胆的改革，把中药制成浸膏、粉剂和切成黄豆般大小的生药粒。采用这种方法，仅用古代中医方剂量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煎煮后其有效药液的浓度，反而比传统的方法高得多。他们还把中国“医圣”张仲景的全

部医著的药方逐一作出药性分析，以探索中药之能够“药到病除”的奥秘。

日本的学者还声称，要在三五年内，在中医中药方面超过中国。一旦成功，就把“中医汉学”改称“东洋医学”。

日本各大医院各医学院的图书馆里有多种日文的中医中药杂志。中药成方的冲剂在许多药店都有出售。据说日本医师中约有 40%能用中医中药为患者治病。日本一家杂志针对专医消化器官的 256 名临床医师的调查显示，有 62% 的医师声称他们在日常诊疗中使用汉方药。1972 年创建的东洋医学研究所集中了几十位著名的日本中医师，他们不只是用中医的理论诊病，用中药治疗，而且也用针灸和其他一些中国的民间疗法。研究所设有药理、免疫、生化、生药学等研究室，研究中医中药的特点、治愈疾病的机制、服用中药前后人体免疫力的变化等。

日本仙台一家浴池开设了中国传统的药浴（在洗澡水中放入中药），在当地引起轰动，每天顾客排队等待入浴。许多老年人确信中药对延年益寿有明显效果，年青人认为中药可以帮助他们保持美容，减轻体重，甚至增进智力。日本昭和大学医学博士新居裕久说：“在保健方面，许多日本人开始承认中药比西药更有效果。神田书店街上最畅销的一部有关中药的书，书名是《适合你的中药——通俗易懂》，一个月内就售出 8 万册。

据香港《华人》月刊报道，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用五花八门的中草药治病。近几年来，大约有 80% 的美国人在患病时服用过中草药。1981 年，在美国还创办了美洲中医学院，招收在大学学过两年医学预科的学生。全美国针灸学校已有 31 所。加利福尼亚州还举办过中国医学国际学术大会。1980—1986 年间，到中国接受中医药学学习和训练的，有 120 多个国家的 1000 多名学生。苏联、捷克、波兰等国，不但重视中医和针灸的临床应用，而且对中医的古典著作，如过去很难被人理解的八卦学、天干地支学、气功学、三焦学、气血学等的研究已进入现代化阶段。主要由法国发起的国际针灸大会，已先后开过 8 次。

可见，中医中药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迎接这个挑战的希望不能不落在青少年一代身上。

是等待别人来超过我们呢，还是使祖国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在新世纪中更加发扬光大？

历史正期待着我们的青少年做出响亮的回答。

堪称千古奇文

古代的中国人，把外国人一概看成“蛮”“夷”，以为只有中国才有文化。到了1840年，外国人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才逐渐发现原来的看法是大大地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加。人们从这些交往中，不但了解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接触到国外许多文学名著，为之惊叹不已。

这是一个好现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其他民族创造的文化中吸取营养，有助于使我们自己的精神文明更加丰富多采。但是，如果因此而妄自菲薄，认为中国的文化一概不如别人，甚至如有的人所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小说，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

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早有公论，这里不去说它。我只想介绍一下外国学者对我国其他几本古典小说的评价。

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古典小说可能要算《西游记》。这本书已知的外文译本有日、英、法、德、意、西、俄、捷、罗、朝、越以及世界语等各种文字。其中，最早动手翻译的是日本的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他开始翻译的时间是1758年，经过三代人前后七十四年的努力，到1831年才完成了《通俗西游记》的日文译本。其他各国译本的名称各不相同，有的起名《中国的仙境》，有的称为《猴》、《猴子历险记》、《猴三》、《猴子取经记》、《猴与猪：神魔历险记》等等。看来，人们最有兴趣的是孙悟空这个猴子的形象。正如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所说：“书中主角‘猴’是无可匹敌的，它是荒诞与美的结合，猴所打乱的天宫世界，实际上反映着人间封建官僚的统治”。德国大百科全书也说，“它是一部富有反抗封建统治意义的神话作品”。英国大百科全书说，这“是中国一部最珍贵的神奇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说，这“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朝鲜著名汉学家李周洪更说“孙悟空的形象不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也表达了全东洋人民的愿望。”

外文译本更多的是《儒林外史》，它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它的作者吴敬梓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有的外国研究《儒林外史》的论文认为吴敬梓在文学上的贡献，足以和果戈里、菲尔丁相媲美，而《儒林外史》的创作年代却比果戈里、菲尔丁的讽刺作品的产生早得多。苏联汉学家沃斯科列辛斯基则把吴敬梓称为“语言艺术大师”，说他“所提炼的文学语言是非常生动，鲜明有力的”，“描写细腻而深刻”。

《水浒传》得到的评价更高。有一位外国翻译家说，“《水浒传》的描写痛快淋漓，登场人物多种多样，场面也变化多端，真有云烟开阖、峰峦出没之妙。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堪称千古奇文。”有人干脆说，“一个文学家如果连《水浒传》这部作品也不知道，那将成为笑柄。”对于《水浒传》，不但有许多外国学者写了不少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而且日本还出版了研究《水浒传》的工具书：《水浒全传语录索引》。

我们现在有许多文学作品是模仿国外的写作手法写的。可是，我们的古典作品流传到国外以后，也常常成为外国作家仿效的对象。日本学者杉本达夫说：“日本受《水浒传》影响而创作的小说有许多种，其中最长的一部是《南总里八犬传》”。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读了元曲《赵氏孤儿》的译本以后，曾经模仿它写了一部名为《中国孤儿》的五幕韵文体剧。这个

剧曾在法国上演。当时法国哲学家卢梭给伏尔泰的信中说：“我听说《中国孤儿》一剧正大受赞扬。”

我们列举这些材料，并不是想说明中国的文艺作品就一定是天下第一。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的杰出人物，包括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瑰宝。对别人优秀的东西，拒绝学习，是愚蠢的。对自己国家优秀的艺术宝藏一无所知，能算聪明的态度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对这样的问题，大概不难做出正确的回答吧。

日本的《三国》热到《菜根谭》

在世界各民族中，日本民族是一个很善于学习和融解外国文化的民族。古代的日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曾经把学习汉文化作为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要滋养。日本文字就大量使用了中国的汉字。

近代以来，日本转向主要吸取欧美的文化，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的中庸思想、礼乐观念，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仍有很大的影响。例如，《论语》一书，在今天的日本，仍旧是畅销书。自1945年战后至1984年，日本的《论语》译注与研究著作，已经出版了50余种，有的还持续印刷了十余次。儒家的信条，仍然影响着日本人的修身治家。例如，在京都市从修学院道到北白川京大人文所的三公里长的马路上，竖立着三块同样内容的宣传牌，上面用斗大的毛笔字书写着：“昔孟母三迁，今已不能，为可爱的孩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吧”。它用孟母三迁的故事来告诫居民们重视环境对孩子成长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日本文化生活中的影响。

每年7月16日、17日，在日本京都都要举行祇园节，以迎接盛夏，消除鬼厉。这一节日活动是以盛大的彩车游行为中心的。彩车共31辆。第5号车名为“函谷铎”，取材于中国的《史记·孟尝君列传》中“鸡鸣狗盗”的故事；第10号车名为“白乐天山”，取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向道林禅师问佛法的故事；第14号车与第18号车，分别名为“郭巨山”与“孟宗山”，均取材于中国的《二十四孝图》；第16号车名为“伯牙山”，取材于《吕氏春秋·本味》；第17号车名为“鸡山”，取材于尧治天下；第27号车名为“鲤鱼山”，取材于中国民间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影响之深。

我们说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就是说他们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吸取和改造外来的文化，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也收入了日本的小学教科书中。有一位日本小学教师在讲这一课时，就让孩子们一起讨论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有的说喊大人，有的说到水缸边去把掉下去的孩子拉上来，有的说两个人叠起来就可以够着，有的说站在板凳上就可以够得着拉缸里的小孩。有一个同学说丢一个凳子到缸里去让那孩子垫脚。老师帮助同学们分析了各种办法的利弊，特别鼓励了最后一种想法，说别人想的办法都是如何去救那孩子，这位同学却想到了帮助那孩子自救，这是一种新的思路。孩子得救才是目的，被救或自救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如果只在如何救人的方法里打主意，无形中就束缚了自己的思想。这位教师接着指出司马光的长处，不只是一般的勇敢和机智，更在于他能超出常规的思想方法。人掉在水里，一般人的想法，总是在想如何使人脱离水从而得救，司马光的办法却是使水脱离人。这就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这位小学教师的讲解，就为一个古老的中国故事，赋予了现代的思维方法，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创造。

在日本，这种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资料的事例还很多。最近兴起的《三国》热，是又一个例证。日本企业界人士指出：“人们之所以对《三国演义》推崇备至，视为珍品，就是认为书中有宝。在当今激烈的商业角逐中，读读《三国演义》，大有裨益。”他们认为，精心研究《三国演义》，可寻得秘诀，为事业的成功铺平道路。

最近，出版了各种以《三国演义》为主题的管理学著作。如城野宏写了《三国志的人际关系学》、中野直禎写了《三国志的智慧》。以企业家为主要对象的日本《愿望》杂志，也出版了《三国志——商业学的宝库》专辑。

这些日本企业家想从《三国演义》中研究什么呢？主要是《三国演义》中那些审时度势、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利用有利因素战胜对手等等。一位大学教授说：“诸葛亮的机智多谋，给日本企业家提供了有益的启迪。松下电器公司的显赫成功，正是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战略眼光的结果。”社会工业研究所所长牛尾治郎说：“无论在国际或国内，日本的企业家要增强竞争能力，就得学习《三国演义》中应付错综复杂局势的能力。当一个好的企业家，如同当一个明君一样，必须‘对外宽，对内明，以明补宽，以宽补明’”。不少企业家认为，刘备势孤力单，能在豪强中取得立足点，开创一个蜀国，关键在于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在现代企业中，能仿效刘备爱才举才，方可以小制大，以弱胜强，有所建树，获得成功。《三国演义》中的一些失败的教训，也是日本企业家警惕自己的反面教材。藤田公道著的《学习中国武将——乱世飞跃的秘诀》，书名就说明了“三国热”的目的。

除了《三国演义》，日本企业家还注意到中国的《史记》。日本有一本为高级企业家阅读的专门性刊物《总统》，1985年第10期出了《史记的领导学、日立公司研究特集》。在这本特集中从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史记》中的许多人物的成败得失。例如，一篇《汉王朝中兴之祖武帝的荣光与落日》，论述了汉武帝如何主动地否定祖上传下的小康的“稳定”局面，运用“超积极方式”，在争斗中开拓自己的事业；一篇《宫廷中的不倒翁陈平》，研究了陈平的谋略与保身之术，总结他如何在成功之后，虽遭刘邦怀疑，却终能安然处世，并求得发展的经验；一篇《项羽——内线作战，败于垓下》，研究了项羽如何因为感情超越了理智，终于在战略上造成过失；等等。

日本还有一种“帝王学”，其内容当然不是研究如何当皇帝，而是要从许多帝王的经验中研究“创业艰难、守成不易”的道理，为企业的领导人提供参考。他们研究的资料，有许多就来自中国的历史。如守屋洋就翻译了论述唐太宗时期政治经验的《贞观政要》。伊藤肇编写的《现代帝王学》，也面向企业家，提出要学习唐太宗居安思危、求言纳谏、任用贤良、自奉节俭等品德，警惕功成志退，纵情傲物的倾向。后来出版的还有守屋洋的《帝王学的智慧》、佐之克明的《超优良企业帝王学》。

最近，日本企业界掀起了《菜根谭》热。许多企业家人士认为这本书在企业管理、用人制度、业务推销、开拓市场、企业家自身修养等方面，都是珍贵的教材。

《菜根谭》是中国明朝末年洪应明的著作。书名是根据宋朝临川人汪信民说的话：“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咬菜根，意味着过贫穷生活。菜根本身又坚硬多筋，只有经过反复咀嚼，才能体会“真味”。《菜根谭》的书名，就包含着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的意思。在日元升值，日本企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困难的时候，它就成为企业家们爱好的读物。

《菜根谭》是一本语录体的书，分前后集，前集222条后集135条，共357条，集中了儒、道、佛三教的思想，引用了许多先哲名言。日本许多企业家认为，这些名言对他们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要办好企业，归根到底要依靠人的素质。这就涉及选用和培养人才的标准问题。《菜根谭》前集第 139 条论述了德才的关系：“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实。”这种要求德才兼备又以德为主导的思想很适合日本企业家的需要。在日本企业家很注意培养忠于企业的“归属感”，要求每一个成员都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大家庭来对待。

《菜根谭》前集第 179 系说：“登山耐侧路，踏雪耐危桥。一耐字，极有意味。”日本的许多企业家也都认为，无论是艰苦创业，或者是惨淡经营。没有“耐”字都不能成功。

《菜根谭》前集第 130 条说：“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阐述的是既要广开言路，又不要盲从多数，要鼓励创见，保持自己的决策权。许多企业家对此也十分欣赏。许多企业都象丰田公司那样建立了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制度。

《菜根谭》前集第 183 条说：“居官有二语。曰：唯公则生明，惟廉则生威。居家有二语。曰：惟怒则情平，惟俭则用足。”这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日本企业界认为“公”、“廉”、“怒”、“俭”这四个字对于企业家很有用，他们希望用这四条，建立他们在企业中的威信，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达到“用足”，也就是企业利润不断增加的目的。

《菜根谭》前书第 127 条说：“横逆困京，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许多企业家用这个话来激励自己和本企业的员工，战胜困难，特别是为了争夺市场，推销产品，往往遇到激烈的竞争。他们认为，《菜根谭》正是做好推销工作的“好参谋”。在推销前要充分分析市场情况，摸清竞争对手实力，“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在推销过程中，要“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只能奋不顾身，大胆前进。

除此之外，近年日本企业经营者还把研究的领域扩展到《孙子兵法》，把其中的各项原则作为企业经营的战略指导思想 and 口号来应用。最著名的有经营东洋精密工业公司的大桥武夫，他从 1962 年出版《兵法经营》以来，已经陆续著书 30 余种。

需要再重复说明一句，这些，都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料简单地拿来照抄照搬就可以有效的。

令人享尽耳福的乐声

西柏林的“菲拉默尼音乐厅”，这是欧洲最有影响的音乐厅之一。它从金色灿烂的外观、表演区先进的可变式结构到音乐历史文物的收藏，都是世界闻名的。

这个音乐厅是卡拉扬所领导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所在地。到此表演的音乐家必须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艺术家的，否则便没有资格踏上表演区。

1985年6月14日，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登上了这个音乐厅的表演区。每演完一个节目，观众们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演出还在进行中，当地的电台就来要求录制节目；演出商也纷纷来找领队谈判，要求签订86、87年的演出合同。几小时以后，报纸上就出现了大幅剧照和评论文章。文章评论说：“中国音乐家的演奏有足够的力量震撼世界。”柏林民族博物馆把演出的实况录音作为珍贵资料永久保存。馆长说：“我要让一百年以后的人也来欣赏你们的音乐。”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音乐家包括钢琴、小提琴的演奏家、声乐家在海外得奖的，可以说并不少。但是，他们演唱的多数还是西方的乐曲。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西方人知道得是并不多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民族音乐已经日益为国外的朋友所了解。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评价越来越高，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多。

1979年1月，由上海民乐团组成的民乐独奏小组到南斯拉夫参加世界青年音乐节，演出了《江河水》、《姑苏行》、《十面埋伏》、《月儿高》、《春江花月夜》、《雨打芭蕉》等，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来到后台，有的询问乐器性能和演奏方法，有的走近乐器仔细观摩。他们说：“中国艺术家的演出水平，出乎我们的意料。你们的演奏水平是第一流的，演奏技巧非常高超。”南斯拉夫萨格勒晚报对音乐节的评论说：“这里要谈到中国的音乐艺术家，他们不但以独特的音乐魅力吸引人，而且表现出高超的演奏深度”。

1979年7月，由中央音乐学院组成的民乐团到英国、爱尔兰参加达拉姆大学东方音乐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和基尔肯尼艺术节，观众反应热烈。人们认为：中国音乐优美动人，演奏技巧高超，配合协调一致，对乐曲理解得深。特别是一些研究东方音乐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民族音乐是东方音乐的鼻祖，是东方音乐的正宗。

1980年，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乐团、中国音乐家小组等先后访问了日本、芬兰、挪威、瑞典、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美国等国。

日本的观众除了赞赏中国民族音乐的音色独特优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还对“中国民族乐器也能演奏出交响乐的效果”，“感到很惊讶”。

《纽约时报》著名艺术评论家哈罗德·勋伯格称赞美建华的二胡独奏就象妇女如泣如诉地歌唱，运弓千变万化；刘德海弹琵琶的手指如同机关枪飞快而匀称。

1981年10月，赵寒阳、李景侠、徐平心三人组成中国青年民乐小组，赴联邦德国参加电视音乐会。他们演奏了扬琴曲《将军令》、《南疆舞曲》、《映山红》；琵琶曲《十面埋伏》、《阳春白雪》、《月儿高》、《寒鸭戏水》；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湘江乐》、《翻身歌》等。听众

反映：“目前，德国音乐听众分两大派：一是古典派、一是现代派。演奏古典音乐的音乐厅内，几乎全是老年人，演奏现代音乐的音乐厅内，几乎全是青年人。双方互不相干，大有不相往来之势。而中国民乐却使两派听众坐到了一起。”

1982年，天津歌舞团出访美国、爱尔兰和塞浦路斯，参加兰格伦、比林翰、世界音乐舞蹈艺术节。中国民族音乐的独奏和合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观众反映：“中国的民族音乐，描绘出一幅幅秀丽、栩栩如生的画面。每首乐曲都象一首诗，听不够，令人陶醉！”“你们出色的演奏，改变了我们对中国的看法。”“中国民族音乐朴实、深刻，打动人的心灵。”“中国的民族乐器太奇妙了，能出色地表现人的各种感情。比如，二胡的乐声，简直象是在同你娓娓交谈。”

1983年7月，青海歌舞团的民族乐队随团参加在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国际联欢节、突尼斯迦太基国际民间艺术联欢节、土耳其萨姆松民间舞蹈节、马尔他国际艺术节演出，演奏了板胡、琵琶、扬琴、笛子独奏曲，观众掌声如雷。突尼斯哈马迈特国际艺术中心主任称赞说：“我们看到并享受到了真正的艺术。”

1983年10月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应邀赴新加坡与香港中乐团联合演出琵琶协奏曲《夕阳箫鼓》、《草原姐妹》，独奏曲《瀛洲古调》、《霸王卸甲》等。新加坡音乐界称赞刘德海说，“他的轮指细密，音色清亮，力度匀称，速度放收自如。最难得的是琵琶音色之美和丰富，在他的指下，发挥得颇为淋漓尽致。”“他的技巧卓越，处理独特，富有个性，演奏时心神贯注，从而结合产生出来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均极高。”

1984年，中央民族乐团赴美国洛杉矶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随后又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巴尔第摩、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纽约、旧金山、克里福兰等2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特别赢得了美国音乐界的好评。他们普遍反映，“真没想到中国的民族音乐竟这么优美感人，这么丰富多彩，令人大开眼界，享尽耳福！”

1984年10月，苏州市民族古典音乐演奏团访问了意大利威尼斯，演出节目有笙、箫、箏、琵琶、二胡、笛子、古琴独奏，及苏南十番鼓、江南丝竹、昆曲吹打乐民乐合奏。听众反应十分热情。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到后台说：“你们不愧是东方文明古国，才能有这样高超的音乐艺术。”

中国的民族音乐艺术确实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民族乐团在西柏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许多记者就为“埙”这样古老的乐器而惊奇不已。当他们知道有二位演员演奏的二张古琴分别是600年和800年前的珍品，更是满座惊叹。有的记者不解地问：“象这么珍贵的文物在欧洲是放入博物馆里的，你们为什么还在使用呢？”中国的同志回答说：“乐器只有在演奏家手里才有生命力，放入博物馆中就是只能供人观赏的古董了，而且我们的演奏家比博物馆的管理员更懂得爱护它、照料它。这两张古琴也一直在演奏家手中流传了几百年的，它们的声音已经变得无与伦比的美了。”

1985年5月，民主德国著名的乐器学家和音乐图象学家巴赫曼博士专程来华访问。他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出版《图片音乐学》、《古代中国》分册的编辑而来的。他参观了浙江、陕西、河南、湖北的博物馆、考古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以及中国音乐研究所等单位。巴赫曼对中国具有7000年历史的灿烂音乐文化大加赞赏。他说，真没想到中国的古代音乐文

化是那么绚丽多彩，你们是巨人，而我们欧洲只是侏儒。

由于古代在技术上缺少录音手段，音乐文化自然不如其他文学艺术的样子容易得到交流，西方人对中国民族音乐缺少了解是很自然的。作为一种弥补，一些欧洲的音乐家就自己根据中国的古诗来作曲。在这方面，贡献卓著的首推奥地利作曲家马勒。

1907年，马勒横遭王公贵族的攻击，愤然辞去了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职务。次年，他来到了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在读了随身携带的一本名为《中国之笛》的中国古诗集以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从诗集中选取了七首唐诗，谱写了一部交响声乐套曲，取名《大地之歌》。作品于1911年11月在慕尼黑首演，至今一直受到普遍的欢迎。

这部交响曲共由6个乐章组成，7首唱词分别采用我国唐朝大诗人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作。第一乐章《咏人世悲愁的饮酒歌》，唱词是从李白的七言诗《悲歌行》中摘出的，由男高音咏唱，音乐激越热烈，动人心魄。第三乐章《咏少年》、第四乐章《咏美女》和第五乐章《春天的醉翁》，唱词分别采用了李白的《瓷亭》、《采莲曲》和《春日醉起言志》三首诗作。第二乐章《秋日的孤独者》，唱词的原作者至今还无法弄清，有人说是钱起，也有人说是张籍或张继。第六乐章《告别》是整个作品的核心段落，约占全曲的一半篇幅，唱词采用的是孟浩然的五言诗《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和王维的五言诗《送别》。起伏跌宕而略带忧伤的旋律，把诗人和作曲家对生活热切的期待和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国外作曲家的作品中，李白的诗被谱成歌曲和声乐套曲的，可能是最多的。李白的名作《春夜洛阳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
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此诗先后由瑞典作曲家斯约格伦和奥地利作曲家威伯思谱成歌曲。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和《静夜思》也被许多欧洲作曲家谱成歌曲。德国指挥家冯·弗兰肯施泰因，甚至还把李白的故事写成了歌剧。

苏联的作曲家也曾为中国唐诗谱写了许多歌曲。1984年12月14日，苏联国家室内合唱团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演出了为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诗篇谱写的一组歌曲，一共22篇其中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梦李白二首》、《旅夜抒怀》等除炙人口的诗篇。1986年4月21日，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举行音乐会，演奏了根据李白的诗歌谱写的歌曲。

1985年6月30日，中国艺术团访问泰国时，在泰国国家剧院的休息室中，有几位朋友来访，其中有中国留学生，也有泰国的朋友。他们在座谈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民族音乐在国内不太吃香，但在国外却特别受到欢迎。”

“中国5000年的文化，包括音乐文化，全世界都为之倾倒，奇怪的是在国内却有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我年年都到中国旅游。中国的音乐演出令人感到反常。北京很有名的歌唱家，到开封唱的是香港的时代曲。这种时代曲，在此地已经过了时，不吃香了。就说香港歌星吧，有很多到曼谷来，只能在三流夜总会唱，不上座，挣不到多少钱。”“即使夜总会，也并不都唱时代曲。”

听了这些议论，你有什么感想呢？

诗情·画意·乐思

中国的美，凡是到过中国而又不怀偏见的人，几乎没有不承认的。

然而，最动感情的，恐怕还要算艺术家。他们的使命就是发现美，再现美，创造美。因此，他们对美也就具有特殊的敏感。

这里，让我们分别看看一位外国诗人、一位外国画家、一位外国音乐家有关中国的作品，领略一下他们从中国感受到了些什么。

这是一位南非诗人，他的名字叫丹尼斯·布鲁特斯，1924年生。他的双亲都是“有色人”，这在南非是同黑人一样受到歧视的。他从小爱好体育。但南非当局却禁止黑人和有色人同白人一道参加国际比赛。于是，丹尼斯·布鲁特斯发起并领导了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参加奥运会的斗争。1964年，奥运会禁止南非参加。南非当局恼羞成怒，将布鲁特斯逮捕。获释后，布鲁特斯流亡国外。

诗歌是布鲁特斯的重要武器。他从50年代末期开始写诗，出版过多种诗集。他的诗作曾经多次在非洲和英国获奖，被誉为南非最卓越的诗人之一。

《中国诗抄》是他在访华期间写的30多首短诗的结集。他自己声明，这是“作为友谊的礼物，奉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

布鲁特斯一到北京，看到的是：

“ 条条林阴道，
绵延几里长，
林中蝉儿歌唱。 ”

这几行诗表面在写景。但是从这平凡的景色后面，却可以看到作了主人的中国人民在和平环境中的劳动。这对于来自实行种族压迫制度的南非的布鲁特斯，不能不是一幅令人激动的画面。

布鲁特斯登长城后写的一首短诗，也是只有三行：

“ 长城，
一个士兵，
手捧鲜花一枝。 ”

这三行诗中，可以说是蕴含着无限的情思。长城，是保卫祖国的象征。人民解放军战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长城。他们手中捧着的鲜花又说明什么呢？中国的和平环境？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对外国友人的深切情谊？请读者去想象吧。但是，请不要忘记，诗的作者本人多次遭受过南非军队的毒打，背部至今还留着枪伤。

了解布鲁特斯的经历，对他参观故宫御花园时写的诗，应当不难理解。这首诗写道：

“ 御花园中的树，拒不接受，
大理石的约束。 ”

故宫曾经是中国封建君主的住地。这里的一切都体现着封建统治的权威。然而，大树却并不接受石板的镇压，勇敢地伸直了自己的身躯。今天，整个故宫也早已回到了人民手中。这对于饱尝过“恼人的暴力”，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布鲁特斯，怎能不是有力的鼓舞呢？

在中国诗画是相通的。诗人用文字作画，画家则用线条和颜色写诗。古人还往往称绘画为“写画”。英国画家大卫·金蒙特作的北京速写，就很有诗意。

金蒙特先生还是个著名的美术史学家。他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在布里斯托大学执教并领导该校的建筑美术研究工作。他曾经三次访华。金蒙特说：“北京和中国似乎给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我的生活需要这些东西。通过它们，我的艺术的自然生命力得到恢复和发展，打开了新的视野和有待探索的新领域。”他还说：“到中国来我感到自己是生活在人民之中，感到跟他们发生着自然的联系。”

金蒙特以北京京剧为题材的作品在英国展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关于一幅题为《京剧》的速写，他写道：“我承认自己在西方歌剧方面的素养对于了解中国京剧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只能通过翻译来了解剧情。然而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如此丰富多采的东方剧种很快就吸引了我，使我禁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去欣赏它。”

金蒙特还专门为京剧的琴师画了一张速写。他说：“我很快就发现这位音乐家虽然只在舞台的最边侧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弓弦却贯穿在整个表演的命脉之中。他的专心致志的演奏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情不自禁地留下他的身影。”

有一幅速写，画的是北海公园，湖面上一群游人正在溜冰，空中挂着美丽的灯笼，树枝在寒风中摇曳。作者说，“1987年春节快到了，公园里张灯结彩，一派节日景象。我坐在一座茶室内，向窗外望去，在冬日阳光的沐浴下呈现出这个画面。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17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在这种创作意境中，不知不觉完成了这幅画。”

还有一幅画题名《龙爪槐》，1987年1月20日作于北京大钟寺。作者说明：“一口小钟挂在一棵古树上，这两者的结合，显得如此和谐，使人产生许多遐想。”

作者还画了一张睡着的大熊猫。为什么不画熊猫的动态呢？原来，“当我兴冲冲地赶到熊猫馆时，已是快到静园的时刻了。可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真的大熊猫啊！我急忙拿起照相机，才想到闪光灯里没有电池。幸而纸笔随身不离，便立即留下它的动人睡态。”

如果说速写可以当场完成，诗句也可以基本上在现场诞生，事后只要略加润色即可。那么，音乐作品，特别是交响乐，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写成的，而往往是魂牵梦绕的结果。难怪人们要把美国作曲家沃尔特斯的交响诗《漓江倒影》称作“一个美国音乐家的中国梦”。

沃尔特斯既是作曲家，又是指挥家。他的《第一交响曲》从1985年以后，成为美国一年一度的林肯纪念日的必奏曲目。

1984年，沃尔特斯曾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授美国语言和文化。在这一年中，他饱览了桂林山水、古都长安的风光，也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和兴奋的一年”。直到他回国之后，他说：“我脑中最强烈的意象就是中国风景，特别是桂林山水。”正是这种意象化成了绵绵乐思，他开始用音符来回忆中国。交响诗《漓江倒影》终于诞生了。这是一篇如烟如雾的乐章。在音乐声中，天光波光忽聚忽散，山影帆影忽化忽合，一个高昂的音乐主题渐起，象征着漓江土地上人们蓬勃的生命力。人们通过音乐感受到了漓江的美，也感受到了罗伯特·沃尔特斯对中国风光的热爱。

沃尔特斯在《漓江倒影》的创作中，使用了中国式的音乐表现形式——五声音阶和多调式的关系。他说：“我爱中国美妙的风景，也爱中国美妙的音乐。”

洋“贵妃”的表演

中国的戏曲以后还会有观众吗？

一些年轻的朋友似乎认为这些古老的艺术对于现代的观众将会失去它的吸引力。

可是，在世界各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声誉却正蒸蒸日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85年，我国戏曲艺术团体出国访问的就有60多个，访问的国家和地区达到45个，遍及五大洲。

许多地方戏曲，包括粤剧、川剧、越剧、潮剧、汉剧、秦腔、闽剧、黄梅戏、花鼓戏等等，在对外交往中，都以其独特的表演赢得了大量的海外观众。

福建漳州芗剧团1983年访问新加坡，演出28场，平均上座率达到98%，观众赠送锦旗121面。

厦门市歌仔戏剧团1985年赴新加坡演出一个月，几乎场场满座。他们演出的《五女拜寿》演到悲凉的《行乞》一折时，观众感动得走向台前，纷纷向台上抛钞票，忘记了这是演戏。湖南花鼓戏剧团1983年赴美国纽约演出传统神话剧《刘海戏金蟾》，剧场里加了三排座，仍然有不少观众席地而坐。”

1985年，四川省川剧院与江苏省昆剧院同时参加了西柏林第三届“地平线艺术”。这次艺术节是以介绍东方文化为主的，重点突出了中国文化艺术。川剧和昆剧的演出都获得了热烈的反响。《每日晚报》说：“川剧团在西欧的首次演出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同时也是第三届艺术节的成功。”《新苏黎世报》称赞川剧“是一种超越国界的戏剧艺术，这一艺术是为全人类创造的。”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则赞扬昆剧说：“在三百年前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升起了两颗艺术明星：西方的歌剧和东方的昆剧。昆剧耐看，耐人寻味。”自由柏林大学甚至决定在学校中增设昆剧课，要求将江苏昆剧院带去的三台戏全部录像，供学生上课作教材用。

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西藏藏戏团到美国的演出。1987年3月，西藏藏戏团到美国访问演出29天，在纽约等城市中演出了26场，剧场观众达到二万多人。美国观众最普遍的反应就是一再惊呼：“Wonderful！”以至藏戏团的大部分成员都学会了这个英语单词。演出的票价高达10—20美元一张，仍旧场场满座。买不到票的人不肯离去，剧场只能加设站票或者坐地票。有的观众甚至驱车随剧团走几个城市，连看6场。每次演出结束时都有许多观众从座位向台上投掷鲜花。“ABC广播公司”一位著名播音员身穿藏戏服装，手拿一个大灯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别人问他手上拿的灯泡是什么意思，他说：“藏戏团的演出，就象这个大灯泡，照亮了美国。”有的美国观众说：“我们的白宫只有一百来年的历史，而你们的布达拉宫就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们太年轻了。”

出国演出最多的大约还要算京剧。这个古老的剧种，外国人能看得明白吗？1987年4月，中国辽宁省青年京剧团访问了苏联莫斯科、明斯克和维尔纽斯8个城市，进行演出。绝大多数苏联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对京剧确实是陌生的。辽宁青年京剧团带去的《穆桂英》、《三岔口》等武戏和以情节为主的折子戏不但使他们看明白了，而且把他们吸引住了。连买站票的人都从头看到尾。一些年轻人说，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色彩鲜明、形式独特的艺术。他们用的形容词是“奇妙的”、“不可思议的”、“无与伦

比的”等等。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两位声乐教师找到了京剧团的主要演员详细询问京剧演唱的发声方法。一群从里加市专程赶到维尔纽斯市来看京剧的拉脱维亚演员，跑到后台要求看中国乐器。当乐队的同志把京胡、月琴、大鼓、小鼓、铜锣等一件件拿给他们看时，他们说：“感谢你们完好无缺地把古老的京剧艺术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得到了美的享受！”莫斯科大剧院导演阿西莫夫语重心长地对中国京剧演员说：“希望你们象保护自己民族最珍贵的文物一样保护美好的京剧艺术，务必要使它千秋万代传下去！”

是不是外国观众只能欣赏中国京剧中的武打折子戏呢？北京京剧院四团在波兰和英国演出《三打陶三春》的情景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回答。波中轮船股份公司波方总经理看完以后说：“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你们的奇妙表演，使我们了解到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幸亏我的夫人不懂中文，否则要学陶三春的样子，我就要逃到月球上去了。”从他这一番开玩笑的话中，可以看出，这位波兰朋友对这出戏是完全看明白了的。

《三打陶三春》为参加伦敦第三届国际戏剧节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演出也同样征服了英国的观众。剧团事先准备的英文幻灯字幕没有用，观众仍旧看得如醉如痴，忽喜忽惊。

英国艺术大臣高里伯爵说：“这是任何文艺形式不能与之相比的艺术。”

《泰晤士报》的评论家说：“这是第一流的剧团带来了第一流的节目，使我们改变了习惯。评论家看戏时难得喝彩，往往倾向于静静的欣赏，但精彩的表演，使我旁边的四位戏剧评论家情不自禁地鼓了掌，而我是第五位。”

该报的另一篇评论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演员优美的动作，故事的喜剧性和那妙趣横生的情节，使得剧情浅显易懂。这确实是一出赏心悦目的好戏。”

《卫报》说：“假如伦敦国际戏剧节仅为我们带来京剧四团，也足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了。”

《泰晤士报教育副刊》说：京剧“色彩丰富，妙趣横生”，“演员出色的表演扫除了一切语言障碍。《三打陶三春》是最优秀、最朴实的了不起的戏，对它的欣赏完完全全是一种陶醉。”

《金融时报》说：“京剧的乐器即使是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仍旧那么迷人，那么充满活力。”

戏剧节的节目主持人说：“在戏剧节上，接待一个如此生动精彩的节目，尤其感到荣幸，你们的成功，使我感到骄傲。这不是《三打陶三春》，事实上是陶三春‘打’了辉煌的戏剧节。”

当北京京剧四团离开伦敦前往曼彻斯特时，后台主任尼尔说：“我真舍不得你们走。假如你们有一个大道具箱，我愿意钻进去，让你们把我带走。”

一部分外国人觉得要长远和中国京剧艺术在一起，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也来学京剧。他们当然并不是专业演员，而是京剧的“票友”。北京京剧四团在伦敦就接待了许多这样的“洋票友”。有两位英国老太太，对《贵妃醉酒》中的“卧鱼”身段入了迷，非学不可。团长没办法，只好亲自去教，整整半天时间，双方都累得满头大汗。虽然学的还不够熟练，但两位老太太已觉得心满意足。她们高兴地说：“我们是跟北京学的，是京剧‘正宗’。”

外国人唱中国京戏出了名的，可能要首推美国夏威夷大学戏剧系副教授魏莉莎。她曾经因为到中国来演出《贵妃醉酒》而被人称为“洋贵妃”。人们还说，魏莉莎演的《贵妃醉酒》是梅兰芳先生在1930年赴美演出受到欢迎

后，梅派京剧在美国的真传。1984年，魏莉莎又把梅兰芳的代表作《凤还巢》逐句译成英文，并亲自导演，组织夏威夷大学戏剧系和音乐系的师生，在美国作了公开演出。

把京剧用英语搬上美国舞台，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剧本翻译就用了将近一年。在首届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魏莉莎说，“我希望让美国观众感到亲切、接近和生动，而不要感到它是遥远的明显的翻译文字；同时，又要使观众中那些了解和熟悉京剧的人承认它是京剧”。于是，她逐字逐句反复斟酌，不但要译出原作的含意、精神和风韵，而且要使英文剧本的词句让美国演员能按京剧的要求来唱念，演员们当然也要多吃很多苦头，他们要练中国京剧的基本功，压腿、踢腿、云手、跑圆场等等。学习京剧练声之前，还得先学习一点汉语，学英文念唱之前，先要学汉语念唱，这样才能唱出韵味。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呢？“洋贵妃”说：“中国戏曲是古代文明的结晶，它被列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之一，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希望传统的戏剧形式，不论中国还是其他地区的，在21世纪中能够保存下来，并切实得到发展和提高——我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努力从事这一事业。但我敢肯定我们同时抱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那就是创造出新的、生机勃勃的世界戏剧形式，这需要继承世界各个民族的戏剧遗产，并不是盲目混乱地把各种不同的技艺形式混杂在一起，而是要进行创造性的综合，并发展它们的美学基础。”

这就是“洋贵妃”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将怎样应战呢？

又一个“五连冠”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员，称雄世界乒坛多年，男女乒乓球队，都曾经得到“五连冠”的荣誉。

另一个“五连冠”，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这就是中国的杂技演员在八十年代，连续五年在巴黎世界“明日”杂技比赛中，夺得金奖中的首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杂技，在旧中国是被人瞧不起的，是街头摆地摊的“杂耍”，“下九流”的“手艺”。

新中国成立以后，杂技艺人得到了新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组建了国家杂技团。他们的演出，不但赢得了国内的老少观众，而且也为中国赢得了许多外国朋友。中国的杂技艺术团多次出国访问演出，参加世界比赛，足迹遍及五大洲。

早在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华杂技团”就成为第一个出国访问的艺术团体，到苏联访问演出了五个多月，被苏联人民誉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与和平的使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勇敢、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勤劳与智慧。”

那一次访问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艺人关玉和，一个人表演了《蹬千斤担》、《钻圈》等节目。他在表演足蹬千斤担时，仰卧地上，脚蹬、手举，能同时承担4付石担和4个成年人，总重量超过500公斤。他在表演钻地圈时，又窜跳翻腾，身轻似春燕，矫捷赛猿猴。特别是表演钻小圈时，他能将身体折叠着从直径不足肩宽的小圈里钻进退出，轻松灵活。这使广大苏联观众十分惊奇，人们都想知道，这位老人的骨骼是如何构造的。为什么一会儿能力承千斤，一会儿又柔软如绵。最后，报纸上的评论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有天才的人是不会老的！”

此后，中国杂技团的每一次出国访问几乎都成了轰动当地的新闻。

美国图森市议会通过决议，把中国杂技团去访问的日子（9月15日）定为“中国杂技日”。

丹麦《政治报》说，中国的杂技演出，“是一个奇迹”，“看的人直怀疑在他们的字典中，哪里去找恰当的形容词来表现那天晚上的演出。”

中国杂技团在马来西亚演出的票价达到50马元（邓丽君在马来西亚演出的最高票价为30马元），连通道的阶梯都挤满了人。首场演出鼓掌达到219次。

1985年，中国首次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杂技锦标赛，便勇夺4项冠军，1986年在伦敦世界杂技马戏锦标赛中，中国又获得了全部25块金牌中的22块，还夺得了最高分奖“黑湖塔”奖杯和团体冠军奖杯。

中国的杂技团还曾经4次获得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比赛的“金小丑”奖和特别奖。

这些都是高水平的角逐。

以12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杂技比赛为例。墨西哥伊迪兄弟马戏团表演的节目，把16头大象，8头骆驼，几头野牛和野鹿等动物，指挥得如同听话的孩子。意大利的兰多马戏团带去了12只斑斓猛虎，既凶猛，又温柔。驯虎者驾着三轮摩托车在虎笼内转圈，两只猛虎突然吼叫着扑上去，分别坐在一旁一后。其中一只猛虎还含情脉脉地与主人亲吻。美国演员杰斯在“小绷床”

节目中，扮演一个酩酊的醉汉，在绷床上翻滚、跳跃，惟妙惟肖的表演使观众笑弯了腰。匈牙利演员的走钢丝，是在 15 米高的绳索上，不挂保险，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如履平地。

面对这样的竞争者，“金小丑”奖竟被中国沈阳前进杂技团的 6 个小伙子的“钻台圈”节目赢来了。观众当然并不知道，其中有的演员还曾因为受伤瘫痪过，现在却在舞台上似燕子穿帘般地跳跃自如。

在这次比赛前，当地一位工作人员问一个孩子：你见过骑独轮车吗？孩子点点头。那人又问：你见过在独轮车上用脚把碗踢到头上吗？孩子笑笑说：听说过。那人又问：你听说过独轮车下面是一个大球，并把碗踢到头顶上吗？孩子皱眉摇了摇头说：没听说过也不可能。可是，中国小巧秀气的杂技演员傅秀玉却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动作。第二天报纸评论说：“此节目为世界首创。傅秀玉小姐的高超技艺为本届比赛增添了光彩，创出西方人不敢想的杂技奇迹。”

30 多年来，中国杂技团访问加拿大演出已经有过 5 次了，1986 年 5 月，第 6 个小型杂技艺术团去加拿大演出仍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最有意思的是在大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远东厅演出《敦煌造型》。大厅里陈列着数尊东方佛像，那闭目合掌的神情，简直同节目中的某些动作毫无二致。一位观众说：“有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分不清哪是演员哪是佛像。演员似是塑像的复活，又似是在与塑像争辉；而那佛像仿佛是配角，又象是演员动作的凝固。这真可谓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完美结合！”魁北克著名艺术家让·贝斯雷赞扬道：“他们使用世上最完美的道具——他们的身体，所创造的艺术就是把握身体，竭尽全力发挥其表现力，如此才能享受到与观众沟通的乐趣。”

孩子们的反映则似乎更直截了当些。在多伦多，有位小朋友看了《敦煌造型》和《滚杯》后，找到中国杂技团的工作人员问道：演员的关节是否比常人多？回答当然是：中国杂技演员的骨骼关节跟大伙儿一样，并非机器人。但是，他听了仍觉半信半疑。还有一位小朋友看到滚杯的演员全身顶着玻璃杯叠成的 6 个宝塔，从仰卧转成俯卧，又从俯卧翻成仰卧。尽管她与演员才相距 2、3 公尺，连酒杯中水的轻轻晃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仍认为难以置信，直到让她亲手把 96 只盛水酒杯和 30 块圆玻璃仔细摆弄一遍，确信此中并无机关后，才得出“这不是魔术”的结论。

1985 年夏天，中国的魔术杂技团还访问了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斐济、西萨摩亚、塔希堤（法属领地）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在不到 2 个月的时间，在这些岛国演出了 39 场，观众达到 10 万人次以上，萨瓦伊岛一共只有 3 万人口，有 2 万人看了中国杂技团的演出。斐济的接待人员流着眼泪说，“你们不仅演得好，而且心地好，尽量满足我们当地人民的要求，你们太辛苦了，我们将永远记得你们，你们的表演和你们的友好态度将成为我们 5 年内的话题。”萨瓦伊岛上唯一的一所政府中学的校长说：“多少年来，只有中国艺术团来到这个遥远的海岛为我们演出，你们的演出为我们子孙后代播下友谊的种子，我们岛上的人民，特别是孩子们，将永远记着你们。”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文明宫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代文明展，展出了 180 多件中国的国宝。展出期间，中国的杂技团在文明宫前举行了一次演出。参观者面对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固然是赞叹不已。而当了解到中国的杂技艺术的历史同那兵马俑、金缕玉衣年代相当时，更不由愣住。有的观众，半晌才

迸出一个词：“中国！”好象其他的话都无法表达当时的心情。

在杂技界同行心目中，更值得他们羡慕的，则是新中国杂技艺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保障。

中国杂技团一次在挪威访问演出。有一天，各国演员在海滨浴场沙滩上晒太阳闲谈中，西班牙演员候赛问我国演员李小珍：“在挪威演出季结束后，你们还到哪里演出？”李小珍回答说：“哪里也不去了，先回国和家人团聚。”

“不演出了？”候赛有点儿奇怪，“那靠什么收入维持生活呀？”

李小珍说：“国家发工资啊！”

“不演出也有工资吗？”几个演员异口同声问。

当他们得知我国演员享受的基本福利待遇时，都愣住了，一双双惊讶而羡慕的目光望着我们，连连发出感叹声。候赛则耸耸肩，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你们整天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呢，原来你们无后顾之忧啊！羡慕，羡慕。我们可没有你们幸运。我们现在正急着为签订下一个演出合同到处联系。如果没有新合同，我们就要失业。”

意大利演员、矮人奥兰托十分聪明、精通4国语言，已在阿诺德马戏团干了5年，他也说：“我赚的钱不敢乱花。你们生活有基本保证，可我，在挪威演出结束后回到意大利，不可能马上找到新的职业，但吃住都得用钱，弄不好，我就要在马路上熬过寒冷的冬天。我过过马路生活，那滋味不好受啊！”他表示希望今生能有机会到中国看看。

有些西方国家杂技演员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英国演员提米夫妇带一个7岁的小女儿，在挪威演出期间，一家3口住在一辆美国福特牌大型旅游车上。提米的夫人蒂丽腿肿得厉害，向中国演员要了一点药。她说：“这就是我们演员的生活！腿肿成这样，也得坚持演出，不然，人家就要按合同扣钱。”中国演员安慰她说他们那辆旅游车很现代化。蒂丽说：“不过，我们全部财产就是这辆车。为了演出需要，我们用多年的积蓄买了这辆车，除了这辆车，我们在英国没有任何房产。还有孩子已经7岁了，整年跟着我们在外过流动生活，无法上学读书”。蒂丽的丈夫提米补充说：“挪威演出结束后，你们可以坐上飞机回国与亲人团聚了。但我们得自己开了车回国。在漫长的旅途中，万一发生行车事故，把车毁坏，就倾家荡产了。即便安全回到英国，如果几个月没有新的演出合同，生活就要濒临困境。不象你们，没有失业威胁，一切都有国家支持，真是太令人向往了。”

美食之国

中国菜是世界闻名的。

无论是花样的丰富，味道的鲜美，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大概只能推中国。

中国被人誉为“美食之国”。

北京的饭馆里有一道菜，名叫“42公里”，实际上不是菜，而是手拉面。一公斤面粉，在厨师的手中，揉成面团，然后不断地拉伸，越拉越细，拉成长达42,000米的龙须细面。看过当场表演的外国朋友无不叫绝。

从东南亚到欧美各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中国餐馆。

东京的“中国料理（餐馆）”数目曾经比中国北京的全部饭馆的数目还要多。

在罗马街头，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用汉字写的中国餐馆的霓虹灯大招牌。

1986年10月，中国的厨师代表第一次参加国际厨师烹饪大赛，一举夺得9块金牌、20块银牌、5块铜牌，轰动了大会，也轰动了举办这次大赛的城市布拉格。

世界厨师协会联合会主席汉斯·富士勤先生说：“中国菜，超级的！”他说：“中国对西方烹饪界的贡献可以追溯到十三四世纪，即马可·波罗带着美好的中国调料、茶叶和食品回到欧洲大陆的时代。中国最早的烹饪技艺大师们是来自广东地区的厨师们。中国厨师们特别注意食品的新鲜，加上出色的技艺，现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国的餐馆和中国的烹饪艺术。”

他称赞中国菜讲究配比，几十道菜摆上桌后，各种不同的颜色形成美丽的图画，让人看了就是一种享受。

是的，中国历来有把饮食和文化结合起来的传统。欣赏风景时，人们会说“秀色可餐”；在餐桌上，不但可以把菜肴拼成美丽的图案，还可以用萝卜、茄子、白菜刻成五彩缤纷的花朵，愉目怡神，同时也就增进了人们的食欲。

由于第5届国际烹饪技术大赛是在布拉格举行的，“中餐热”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显得分外热烈。“中国饭馆”、“中国餐厅”、“中餐部”、“中国菜”等在全捷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亲朋好友聚会，主人以能做几道中国菜招待客人为荣。丈夫以能买到一本“中国菜谱”讨妻子欢心而快慰。夫人也以为丈夫做样“中国菜”而欢欣。到中国访问归来时势必带回一些中餐佐料。

在捷语词汇中，“宫保”是作为中国名菜的代名词出现的。原来，在第5届国际烹饪技术大赛的开幕式上，“北京烤鸭”荣获了金牌。10月14日，中国厨师在布拉格文化宫当场献艺。在新闻记者和蜂拥而至的参观者面前，中国厨师象变戏法一样，叮叮当当一阵就做出了5盘“宫保肉丁”。人们看到那如珠宝似晶莹，而又散发着诱人香味的好菜，不能不拍手叫绝。此后，布拉格人学做“宫保肉丁”风靡一时，而且“宫保”一词还丰富了捷语的词汇。

捷克斯洛伐克一位著名中国餐馆的经理兹·弗利德尔说，“我们对中国的古老文明非常崇敬。中国烹调艺术是中国古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说，“我们的总理什特劳加尔访华归来时说，在布拉格至少应开设5个中餐馆，每个州也要至少开办一家中餐馆。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至于我们这

个中餐部，今后也要越办越好。”

中国的饮食不但讲究色香味，更讲究营养。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在《本草》中就列入了不少食品，许多地方还专门开有药膳餐厅。

1987年春，“上海福寿宴烹饪技术演示团”到新加坡讲学，演示“中国食疗”就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效果。

“上海福寿宴”的第一道冷拼盘取名“神农百草艺拼”用传说中中国农业和中国医药的创始人神农的名字命名，体现了中华“药食同源”的历史。它的主要原料是鲍鱼、蛋卷、火腿、香菇和芹菜，再配上人参、灵芝和枸杞子，色彩鲜美，构图艺术，而且有补气安神、明目益肝的作用，对患气喘、失眠症的人都可以有些帮助。

整个“上海福寿宴”的设计，是根据我国《黄帝内经》中“食饮有节，五味调和”的法则，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理论而产生的。不但“食方”都有出处，而且用料都经过精选，所以能够做到没有药味和异味。食后不饱不胀，营养和疗效却恰到好处。这就自然得到新加坡和东南亚一带群众的欢迎。新加坡总统黄金辉也亲自品尝，对“福寿宴”赞不绝口。

中国饮食的声名，使中国的食品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成为群众喜爱的商品。1987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浙江省的梅林牌糖水黄桃罐头和蘑菇罐头就得了金牌奖。参展的中国食品，如仙桃和荔枝夹心糖、椰子糖、龙虾片、菠萝罐头、桔子罐头等都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蒸煮袋装的中国菜肴，更使朋友们连声叫好。他们说：“中国人识饮识食，不但善于选择新鲜和富有营养的食品，还善于寻求新食物、新烹饪方法和新口味。”

我们希望，中国的食品永远在世界上享有盛誉，更希望享有盛誉的不只是食品。

“l o”是什么意思

保罗·格林夫妇是美国人。

他们来到中国旅游。陪伴他们的翻译姓李。他们觉得，称呼“李先生”似乎太正式了，可是又不知道中国人的习惯应该怎样称呼。于是，他们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得到的回答是：

“叫我l o李好了。”

他们又问：“l o是什么意思？”

“l o就是老的意思。”这个回答使他们更加纳闷了。因为李翻译告诉过他们，他只有四十五岁。他们据此对李翻译的回答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是你并不老啊！”

“这没关系，”李翻译说。“我们喜欢这样彼此称呼，即使是在我这个年岁。”

保罗·格林夫妇仍旧不太理解，对于用这个“l o”字来称呼李翻译也不太习惯。他们两个人都是六十多岁的人，可是并不喜欢别人说他们老。要他们开口称比他们年轻的人老，怎么能不感到别扭呢？几天之后，保罗·格林夫妇就了解到，在中国，这个“老”字并不象在西方那样含有贬义，而是一种尊称，甚至是一种爱称。

保罗·格林把他在中国的这一重大发现记下来，回国以后向他的同胞们做了郑重的介绍。他说：

“同我们的社会中老年人往往受到忽视甚至孤立的情况相反，中国这种对长者的态度，用西方的眼光来看是很值得羡慕的。”

和保罗·格林有同样感受的外国人还有很多。因为，在欧美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国中，老年人的处境，实在是不很美妙的。

我们听说过，在美国、加拿大，都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老人默默无闻地死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才被别人发现。最近，我们又看到这样的报道：法国有一位老妇人，在她住的公寓房间里，死了六年之后，才被修理工人偶然发现。

在这些国家里，一般的老人，大多数晚境相当凄凉。儿女很少去看望他们，更不必说照顾他们的生活了，逢年过节，能够打个电话，寄张圣诞卡，表示没有忘记父母，就算很不错的。老年人的伴侣，只有电视机，再加上养一只小猫之类。当然，这样的生活也需要有一笔固定的收入才能维持。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的老人，靠救济为生，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度日，那就更惨了。

有人说，这是工业化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好象社会愈前进，道德水平就应当愈低。

保罗·格林在中国访问两周的见闻，驳斥了这种错误的观点。

敬老，固然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在中国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究竟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呢？在工业集中的城市和生产比较落后的农村，情况有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保罗·格林记述他的访问经过说：

“我们在两周访问中，同相隔甚远的不同地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员们的谈话表明，在共产主义的中国，对老年人的关心并没有多大变化，在许多方面还（比从前）得到了加强。”

“在中国，我们每到一处都体会到人们对老字依然亲切如故，并且亲眼看到老人的社会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这一切的确使人感到鼓舞。”

为什么中国能够做到这样呢？保罗·格林看到了三条。

第一是法律的保证。“中国是世界上规定儿女负有奉养年迈的双亲的责任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第二是政府的工作。“如今，政府把维护赡养老人的传统当作一项首要的任务来抓。”

第三是学校的教育。“学生们从教材里读到关于扶助老人、和为老人做出牺牲的英雄事迹。”

这三条都是事实，但是还不能算是最根本的事实。因为，人们还可以问，有些国家为什么不实行这几条，或者虽然也有所实行，却不象我们这里这样见效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全体劳动人民都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共产主义道德在整个社会的日益普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为社会提供了有益劳动的人，都理当受到社会的尊敬。年纪大，一般情况下，说明过去为社会提供劳绩的时间长，而且也往往具有较多的学识或者经验，这些对于后来的人是很可宝贵的。他们受到后辈的尊重是很自然的。而且，按照自然法则，每一个年轻人总是要老的。尊重老人，正表示我们对前途，对我们自己的晚年，充满着信心。

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就不好解决。在那里，通行的原则只能是极端个人主义。追逐金钱和眼前的利益，把罩在家庭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都撕破了。尊重社会上的老人，那就更谈不上了。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前途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人们也无不生活在前途的危机之中。老年人的遭遇，就是笼罩在整个社会的壮年、青年以至少年心上的一大块阴影。由于旧社会残余思想的影响，在我们这里也会有一些人，不但不懂得尊重老人，而且还会做出歧视、虐待老人的丑恶行为。他们必然要受到舆论的谴责，以至法律的制裁。而尊老之风则必然要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日益广泛地渗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公民的心田。

对中国的怀念之情

1987年春天，《北京晚报》社收到一封从菲律宾寄来的读者来信。全文如下：

《北京晚报》的编辑同志们：

你们好！我是《北京晚报》的一个热心的读者。我很高兴在菲律宾也能收到《北京晚报》，能够看到中国的发展，感受到北京乡土的气息。

我叫玛宁宁·明克兰特，今年十五岁，父母亲曾在中央广播电台菲语组工作过。我在北京生长，于去年七月回国。父亲现在在菲律宾大学（U、P）教《现代中国》和中文。我在一所女中上学。

回国以来，我经常在这里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上发表文章、诗歌。虽然经常同这里的华人接触，但仍常犯“思乡病”。多亏《北京晚报》，每当收到它时，我总把自己锁在屋里，关上窗户，打开电扇（因为太热），屋里的摆设一大半都是从中国带来的，这个时候，我便轻轻打开《北京晚报》，我感觉又回到了北京。那才叫“盖了帽了”！我有一首小诗，题为《伙伴》，曾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现在我把它抄给你们。

我默默承受所有的苦恼，
我对流言给予冷笑，
不管心压得不能喘气，
也不管身体被恶梦缠绕。

直到你也默认了苦恼，
直到你也嘲笑那流言，
直到我们发现了彼此，
才知道你、我都有了伙伴。

最后，我要再说一句：我很高兴在马尼拉读到《北京晚报》。

你们的读者 玛宁宁·明克兰特

看得出来，这位菲律宾姑娘正在热切地寻求新的伙伴，同时她又不能忘记在中国的伙伴。她在自己创造的假想的“北京”环境里，就觉得“盖了帽了”。这样一种感情，恐怕不是一直在社会主义中国生活的少年人可以容易体会得到的。许多宝贵的东西，往往要在失去它之后，才更感到它的可贵。生活在幸福之中的人，却往往觉得这些幸福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日如此，并不希罕。

北京有什么使人眷恋之处呢？

我们还是选一篇外国人关于北京日常生活的小报道来看一看吧。这是美联社记者写的：《北京春季的星期天》：“人们聚集在月坛公园里，参加首都第一个戏迷游园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在200个自由市场上选购五彩缤纷的春季时装。

“在阳光明媚、春意融融的星期天，北京市民的这样和那样的闲情逸致和暇时消遣，反映出这个城市的950万人口，过上了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西城的月坛公园，清朝皇帝曾在此向月神献牛，而今很多戏曲爱好者围成一个个半圆圈，观看37支业余的或专业的戏剧团体表演节目。

“来自天桥街道文化小组的77岁老奶奶，在三弦和二胡的伴奏下，表演了一段熟悉的曲牌，赢得了围观者的称赞和热情的鼓掌。

“公园的另一角，一个年仅十岁的小男孩以他出色的嗓音博得一群身穿毛式服装鉴赏家的喝彩。

“戏剧爱好者参加星期天的露天游园会，每人花两毛钱。携带着孩子的父母还可以给小孩买玩具面具、刀剑，同时还有‘麻花’、‘豆沙包’等快餐供应。

“数千个早起者提着鸟笼沿街散心。星期天，他们前往鸟市去补充鸟饲料，并和别的爱鸟老人交流养鸟经验。

“放风筝的人充分利用广阔的天安门广场。

“各单位派出汽车，帮助人们到新修复的风景点春游，包括新修建的长城旅游区——慕田峪以及十渡。十渡位于北京迤南，被誉为‘北方的桂林’。”

读者会发现，这正是北京的一个普通的星期天的普通生活。这样的生活究竟有什么魅力，让这位美国记者津津有味地写进他的报道呢？

春天的北京，的确有很美的风光。可是，这位记者并没有写这些。他写的是人，是生活在和平宁静的幸福气氛中的人。他写了几件普通事。但是，从这些事情背后，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是充满着相互之间的友爱的。这正是最可贵的东西。

这位美联社记者写到了“北京的桂林”，但是没有具体描写那里的风光。另一位澳大利亚《退休者》报的记者简·芒戴则写了一篇真正的桂林游记。她用中国人说的“桂林山水甲天下”来作为这篇通讯的开头。她叙述了怎样在雾气茫茫的早晨游览漓江，怎样打着手电筒参观芦笛洞等等，但是，更引起她的兴趣的，仍旧是人，是捞水草的村民，是游泳的孩童，是叫卖工艺品的摊贩，以及管理人员怎样制止她们抬高物价，是老人们在柳树成行的岸边晒太阳，是一对对恋人举着相机互相拍照，是男孩子们坐在岸边的树根旁练习垂钓。她说：“在这里，无论是白天或是夜晚，人们都可以信步漫游，因为中国人是绝对的诚实，在他们中间事实上是不存在流氓和阿飞的。”她为这篇风景名胜地的游记做的标题也是《没有流氓和阿飞的地方》。在我们看来，她的这个评价是过分高了。中国并不是绝对没有流氓和阿飞，有一度还曾经相当猖狂。这几年少一些了，但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仍然侵蚀了一些人。不过，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位女记者的心情。她确实是在我们这里发现了比山水更美的东西。

有这样感受的外国朋友当然不只是简·芒戴一个人。

让我们来摘引几段小花絮。

1987年2月，“美百达0919旅行团”的客人们天不亮就离开了西安唐城宾馆，搭乘早上的班机去上海。客人离去后，10楼夜班服务员王安立即对客房进行检查，在1014房间，发现床罩上有一个小箱子，里面全是外币和兑换券。他立即打电话到总服务台询问，接着又与机场联系，但飞机已起飞。最后，终于通过旅行社在上海把19张旅行支票、5张信用卡、兑换券和美元2000多元交还给失主。这位美国客人连声称赞：“中国人，真好！”

1987年5月2日上午，来中国参加国际鸟类学术讨论会的日本代表山口正信乘坐在北京开往齐齐哈尔的167次直快列车上。他去上厕所时，似乎感到有什么东西掉进了便池，一瞧又没发现什么。到中午，山口正信到餐车吃饭，取腰带上的钱夹买菜时，才发现装着28万日元的钱夹不见了。列车长知道这一情况后，派乘警改乘南去的列车折回廊坊站寻找。这时，钱夹已被廊坊水泥厂工人朱志武拾到，并交给了南门外派出所。车到山海关，列车长就

把这消息告诉了山口正信。同车的 28 个国家的外国朋友都连声称赞“中国人确实了不起”。

朋友们也不是没有担心。有一位日本朋友，名叫朱宫彻，曾经两次到中国旅游。他回国以后对中国朋友说：“我有机会还要到中国去，中国不仅风景如画，更主要的是人的淳朴、厚道，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往复都路过香港，并且在那里停了几天，那里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比大陆高，但象在大陆那样热情好客，与我书信往来的朋友一个也没有。这次到中国去，看到人民的生活水平比两年前有了不少的提高，再过些年，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变得富裕起来。但生活富裕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变得冷漠了呢？但愿不会如此。”

北京东单祥泰义食品店的售货员张建华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朋友的担心和希望。

这一天是 1986 年 11 月 3 日，下午 6 点半，正是冷食柜台最忙碌的时候。“我要杯酸奶”，一位黄头发的外国人操着生硬的汉语说。张建华微笑着递给顾客酸奶并接过他手中的外汇券，“找您 4 块 6 毛 6。”那位外国人接过钱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张建华在结账时发现多收了 45 元钱。“糟糕”，她猛地察觉到刚才把外国顾客付给面值 50 元的外汇券错当成了 5 元钱。

“在店里干了 5 年，头一次出这么大的差错”，张建华懊恼极了，这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定想办法找到他，弥补过失”，张建华想。“可连外宾是哪国人、叫什么都不知道，怎样找他呢？”就在这一夜辗转反侧之中，张建华想到了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一大早，张建华赶到中国日报广告科，她向工作人员讲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说：“我要自费登寻人广告，向那位外国顾客道歉和还钱。”

“你把钱上交店里不就尽到职责了吗？”

张建华摇头说：“不，要是还不了顾客钱，我会内疚一辈子。”

“可以，不过少找了 40 多元钱，登一个这样的广告却要花 120 元呀！”工作人员提醒她。

“那我也情愿，谁让是我出的错呢！我要挽回影响。”

广告科的同志为了表示支持，最后以三分之一的价钱收了张建华的广告费。

在中国日报社工作的美国专家多特·尤尔被张建华的行为所感动，他建议报纸在登广告的同时发一个消息叙述事情的经过，并为这一消息作了《好啊，诚实永存》的标题。

11 月 8 日，《中国日报》刊登了广告和报道。

11 月 25 日，一封发自西藏首府拉萨的信寄到了北京，写信的正是那位买酸奶的顾客，他叫杰拉尔德·斯艾伯，是来自加拿大的客人。他在拉萨看到了寻找他的报纸，于是写信给《中国日报》转交售货员张建华。

“亲爱的先生或女士：

看到了 11 月 8 日的文章和广告后我写信给你们，我从未想到能找回少找我的钱。工作中出差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避免不了的，何况那天售货员又确实很忙。使我深为感动的是那位售货员竟花了这样大的代价、做出如此的努力去补偿自己的过失。也许她现在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但实际上她后来的行为是真正值得称颂的。这是件普通的事情，从中却体现出诚实、完美的美德。

“钱并不重要，这 45 元请做支付广告的费用吧。我希望这位售货员能够懂得，她这种行为是多么的高尚！”

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署名皮特·瑞治给编辑部的信中说：“非常感谢你们刊登了这样好的事情，那位售货员以自己诚实的行动抬高了售货员的身份，理当受到赞誉。这件事使我感到，诚实的时代并没有离开中国。”

一位美国专家对张建华说：“当我们这些外国人回到自己国家向同胞们介绍中国人时，我们经常要讲的，是你们这些普通中国人的面貌，你们代表了中国。”

是的，“在外宾面前，我就是中国！”正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形象，正是我、你、他，日常的行为举止、工作学习、休息娱乐，组成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只要我们都能保持一颗诚实的心，我们就能用我们的行为证明：诚实的时代不会离开中国。

